

目 录

一、蒋官屯杀曹官始末记

.....王昔永（1）

二、旧政府的户房、糟粮房和卫房

.....胡国典（10）

三、漫话清末民初聊城工商业

.....吴云涛（14）

四、聊城“怀德堂”药店

.....朋 南（33）

五、聊城（解放前）粮食业及其“脚行班”

.....史墨香、吴云涛（60）

六、东昌“万兴金店”

.....李培现（85）

七、武训中学……………牛文华（94）

八、文德小学 ……………孙元芳整理（102）

九、摄西书局 ……………金志远（107）

十、振东书局 ……………牛文华（116）

十一、“海源阁”历劫考略

……………范景华（146）

十二、聊城八角鼓 ……………锐 声（157）

十三、运河演变与流经聊城考略

……………葛 渊（171）

十四、聊城县故城考 ……………梁金中（182）

十五、聊城古迹 ……高萍踪、沈宝章（209）

十六、忆国、共、美三方代表在山东省

筑先县（聊城）和谈片断

……………张 侠（231）

蒋官屯杀曹官始末记

王昔永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正是京津义和团拳民起义。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拆铁路、烧教堂，结果闹到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把北京糟塌了个惨不忍睹。洋人恣意横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以后义和团结束，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赔偿巨款，订下不平等条约。从那以后，教堂势焰更加嚣张，藉清教为名，纵恣“教民”欺压善良，无故寻衅，到处滋生纠纷。就在那头一年，聊城来了一位新任县官曹和浚。到任后，最感烦恼的就是牵扯到“教民”方面的案件。因为闹义和团后，已严令禁止拳民活动，怕他们与“教民”

相互仇视殴斗，但总禁止不住。聊城东乡一带村庄，神拳大刀会、红枪会、黄沙会，还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绝。这些拳民虽然相率啸聚，设厂练武，还是脱不掉那迷信邪门色彩。什么书符念咒，诡称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形同组织，但毫无纪律，还时常和“教民”发生争端。蒋官屯的西南，有个“小店子”村，村里有天主教堂，因而近村有不少入教的“教民”。这类“教民”，固然不能说全是顽民，究竟好人占多数。不过也有少数坏人仗势讹诈，欺凌良善，滋扰闹事。

据说：县官曹和浚在抵任后，因为办理教案不够圆满，已经把他撤职留任。恰巧东乡的一部分“教民”，因事与近村村民发生纠纷，教民竟施用绑架手段，把村民逮捉两人扣押不放，意图讹诈。村民的家属壮年小伙很气愤，他们也正是参加组织练拳习武的人，便在

会中师兄们商量策划之下。带着武器前往，把“教民”掠回三人，同样羈押不放。目的是两下制约，意在双方换人。那知这些“教民”自恃有洋人撑腰，态度悍硬，即喊教堂神甫致公函指责县官，并对知府也毫不客气地严词质问，说地方官管束不善，加害于他们的“教民”。按理说：知府、知县，应当调查真相，分清曲直，来个秉公判断。无奈惧外心理严重，老怕因此惹起交涉，没敢轻掠虎须，反而认为拳民故意酿造事端，给官府添麻烦，决意武力镇压。已撤任的曹官他这时不多揽事也倒好，偏偏他最恨拳民，说他们有意寻衅滋事，民不畏法，非痛加惩办不可。这时拳民已闻讯警惕，麇聚于蒋官屯，人数不少。

曹官先派了一个哨官，骑马前去探听一下虚实。不料进村就被扯下马来，揍了一顿。原因是这个哨官，去年曾到村抓过人。这次突然

又来，一定是抓人来了。拳民人多势大，便不问情由，打了个头破血流，狼狈逃回。曹官闻此登时大怒，立即率兵前去。曹县官坐了轿子，带领一、二百名兵卒，飞奔东乡而来。到了距离蒋官屯西不远的村庄——古军店，他下了轿，脱去官服，换成一个武弁装束，素巾裹头，腰扎丝绦，手持长枪，跨马跃进蒋官屯村。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六年的正月初八日，正是蒋官屯开年第一个大集，四外村庄的赶集、拜年的男男女女很多。买卖、摊贩、杂耍玩艺，集上十分热闹。这群兵丁怒马持枪，蜂拥而至，号声吹起，连响数炮，登时把个集给闹炸了。只见男女老幼，哭叫奔逃，乱哄哄一阵纷扰，惊惶四散。

曹官进得村来，只见本乡团长和庄长等几个老年人，走到马前，拱揖施礼说：“大老爷何必亲自前来，这里教民拘留人的事，是场

误会，叫他们马上把人送回，冰释宿怨，从此两不争斗。”曹官大声呵斥：“全是你们这些无知小子放纵胡为，简直是造反。”团长和庄长，一直央求：“大老爷不要生气，我们担保两下说劝和解，双方放人，决不再闹事。”曹官见他们三番两次地叩马谏阻，气得暴躁如雷。挥鞭叱退了这几个老头，向村里杀去。

这时拳民百多人，已知道官兵进村捕杀，全都藏到一处店铺中，大门紧闭，有的人还上了房，向官兵讲理。曹官高喊：“都要滚出来！不，就烧房子了！”里边的人全不理睬。曹官下令开枪，乒乒十几响，一排枪打过，房顶上的拳民被轰倒了十来名，有的栽下房来。曹官又叫人搬来柴草，堆积铺面门外，高喊：“如不出来人，就要点火了！”话音未落，只见铺门突开，百多拳民蜂拥冲出，各执快刀、红枪、拚命砍杀。那街面狭窄，兵民搏斗一

团，血肉横飞，十分惨烈。曹官正骑在马上，高声喊杀，忽被一掌鞭，打中脖项，就势拉下马来，后又一刀，砍在头上，幸而劈偏，未立即毙命，但已鲜血喷射，昏厥过去。这时有人高呼：“那是父母官曹大老爷！”但已来不及了。这个用掌鞭击下曹官的人，正是拳民小首领“张二面条”。曹官重伤后，拳民纷纷突围逃出四散。这里兵丁和庄长等人，赶快把曹大老爷抬到北边小药铺里，拿刀伤药敷扎后，随即架到轿中，飞速回城。这个非常事件爆发后，东昌知府洪用舟，闻讯大惊。急调齐府属武备各营，亲自率领，火速前去助剿。出城后迎见曹官已经由轿子抬回，洪知府到跟前看时，曹官躺在里边，还能说出“回城再说”四字，及至抬到县署，已是气绝了。

前清时代，县官被杀，那是所谓“大逆不道”的罪行，那真不得了。官府调集了大批兵

马，向东乡蒋官屯以及附近村庄搜捕查拿，捉了很多，绑到城南大教场去杀，并把张二面条（名文祥）、李月俊等拳民首领磔死祭灵。当然那些官兵衙役，凶如虎狼，趁火打劫，不知株连了多少良民，枉死了多少无辜冤魂。据上年纪的谈：“在杀曹官这个大乱子发生后，官兵天天剿捕，蒋官屯全村逃空，有好几个月没人敢回家居住。聊城校场里因这案杀的人难以计数了。连许家营全神庙的和尚也被牵连掉了脑袋。真是白骨撑天，碧血溅地，惨不忍睹。”

事后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引咎自请开缺，他给山东巡抚袁帅，上了陈报，申述事变经过、就当时现场实际情况，有这样几句客观的看法：

“……省中传闻异词，雷霆震怒，用舟亦知势所必然。但曹令之事，不特同城文武意料不及，即起死者而问之，恐亦未必计及。盖事起临时，相逼过猛，以致困兽突围，自罹惨祸，

可伤亦可怪也。……”

杀曹官这事件轰动了东昌府，以及鲁西各县。当时确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后来人们评论说：这场祸患是曹大老爷自取其咎。他如果穿着官服，坐着轿子去召集拳民，加以晓谕，他们是不敢冒然杀官的。他自己混在兵弁中已是“失了官体”。又动用恫吓威逼声势加以逼迫，拳民以为出去也活不了，激怒之下，群情愤慨，豁出一死去拚斗，那必然要造成流血惨案。据说现场拳民和官兵，也死伤数十人之多。

帝国主义，普遍地在我国设立天主耶稣教堂。入教（也叫吃教）教民，恃洋人势力，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更加忿怒，所以这类的神拳会道自然萌生，设坛聚

众，亦近疯魔。这是善良的农村劳苦人民不愿忍受洋人的凌辱、压迫。妄想练就“刀枪不入”的法术，去杀鬼子。但缺乏正确领导者引其走向反帝斗争，只凭邪魔迷信去对付强敌，那还不失败吗？

旧政府的户房、漕粮房和卫房

胡国典

清末民初，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设有兵、吏、礼、刑、户、工六部，而在县的行政机构中则相应设有“六房”。这里只就与地丁钱粮（即农业税）有关的户房、漕粮房和卫房的情况简单加以介绍。

聊城县在清代至1938年日寇占领县城为止，农业一直沿袭着按地亩多少完纳钱粮银子的税收陈规（据悉日寇占领期间纳税办法未变）。

征税时间正是夏秋农忙季节，因而叫“上下忙”，但又因税收数额不同，又分“县地”、“卫地”两种。征收“县地”钱粮的单位叫做漕粮房，漕粮房又归属户房掌管。因为户房是

掌管户籍人丁的单位，所以农民完粮纳税直接归属于户房。征收“卫地”的钱粮单位叫做卫房（聊城有东昌、平山两卫，后来平山卫并于东昌卫）不归户房所管。

这些房科人员不属官府任命，系“幕僚”性质，没有固定工资。总的头目称为“老总”，统称“老师”，一般税收人员称为“钱粮先生”。他们掌握着全县的地亩册子，这些人文化虽不高，但都能写会算，对征收粮银都有一套“诀窍”，多系终身制。“老总”、“老师”都是经过多年学徒磨练出来的，他们也收徒弟。在房科学徒并非容易事，待遇既低，冷桌子热板凳苦熬多年才能出徒。

房科人员的生活费用由上缴征解费支出，工资虽不固定，收入有多有少，但在征解的田赋中能巧立名目，营私舞弊，因而得到的额外“油水”不少。

县地征收钱粮较卫地偏高，除每年“上下忙”交纳银两外，秋季还要交纳漕米。米的派征数为一亩八勺折米为钱（一石米折为八元），每亩约二分多银。聊城的县地约九千顷。卫地（指屯户地如：五里屯、八里屯、王官屯等）亩数少于县地，征收的银两较县地也轻，约合县地的半数，也不交漕米。田赋从轻的原因，大概是凡属卫地（即屯户地），在清王朝多为“八旗兵”、“满族人”所占的缘故。

催交粮银的手续，由房科（漕粮房又称县房俗称县柜）（卫房亦称卫柜）人员开出传单，由“里分”（又名“里差”“跑粮差”“背里分裕子的”）挨户传递，交纳银两的一亩地按九分交银两，余额归“里分”所有。

催交粮银的弊端甚多，如完粮跟人不跟地叫做“过割”。即地在某庄，而农户迁往另一庄，买通“里分”即可以多报少，甚至不交纳

粮银，叫做“飞地”。

如遇灾荒年景，如水、旱、虫、雹等，报请上级政府核准，也可以酌情减免，但除非重大灾情——寸草不收的境地才能豁免。一般说来，普通年景，只要到期农民不去“完粮银子”，政府即派差役（后来称政务警）带着“传票”找上门去，大吃大喝，欺压农民，声言要抓人押人，结果，有的被勒取几个血汗钱，暂时得到了“宽限”，个别无力交纳钱粮的竟被关押拘留。

交纳粮银时，由房科人员先开补单，后记账，除完交正粮外，还有地方附加各种捐税，如：“教育附捐”“修河架桥附捐”等等。

漫话清末民初聊城工商业

吴云涛

聊城是鲁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仅就记忆所及，访问所得，将清末至民国期间，聊城工商业情况作简略叙述。

一、会馆的建立

聊城过去由于运河漕运畅通，商船络绎不绝，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集散。各地客商云集，他们在此买地建房，设立商号。同乡之间与同行业之间，为了便于集体商议营业，联络感情，维护利益，在东关大闸口，大码头一带的南、北、西面运河沿岸，各省商人建立了不少会馆。最早的一处，是旧米市街南头的“太汾公所”。它是山西商人的临时公寓。以后众商都有了固定营业房产，这里便成了集会

宴釀之处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七三六年——一八一九年），聊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要，会馆陆续增加。根据残存碑碣考查，计有会馆六座。

（一）太汾公所。在旧米市街路东，清康熙年间（一六六二年以后），由山西省太原、汾阳两府客商兴建。已无遗址，现为民宅。

（二）山陕会馆。在东关大码头南，运河西岸，双街的南头。清乾隆八年癸亥（公元一七四三年）山西、陕西两省旅居聊城的客商集资兴建。中有关帝塑像，其主要建筑群今尚保存，现为“聊城地区博物馆”。

（三）苏州会馆，又名“尚余会馆”。在东关运河西岸，大码头南，双街以北路西。嘉庆十一年丙寅（一八〇六年）起兴建，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由江苏旅聊商人集资建成，道光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年）立碑。一

九四七年聊城解放后拆除，今为民房。尚存一座刻有建筑平面图的石碑，置放县粮局后院。

（四）赣江会馆。在城内楼东大街路南。为江西旅聊商人所建。据传始建在东关的“江西会馆”之前，何时建立不详。一九四七年拆除，遗址今为“第四诊所”的后院。

（五）江西会馆。在东关大闸口北，运河东岸，路东。为江西旅聊商人兴建。从前有石碑十六座，纪载会馆创建经过。残存的一座江西瓷特制的大香炉上，有道光十年庚寅字迹。说明这个会馆，始建于一八三〇年之前。一九四七年拆除，旧址今为民房。

（六）武林会馆，又名“浙江会馆”或“杭州会馆”。在东关运河西岸双街南头（山陕会馆南邻）。为浙江旅聊商人所建。碑石已毁，不知兴建年代。一九四七年拆除，今为民

房。

聊城的几座会馆，反映了当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是历史实证。这些会馆多修建在东关运河的码头附近。这里过去曾流传着几句歌谣：

“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

这几句歌谣，说明了聊城运河两岸商业的繁荣。所谓“金太平”，在大闸口以南，紧靠“越河”。这条街有百多家殷富商号的仓库、堆栈。货品如山积，储存量很大。街北面就是越河，出后门就是水，由运河装来的货，可以直接把船泊在后门外交卸，好象水乡苏州一样，十分便利。如今“南越河崖”，已成陆地，连当年越河遗迹也逐渐填没了。

“银双街”，四面八方全为商业集中地区。东关大街、米市街，环绕四周为密布广阔的商业网。山陕帮、江西帮、苏杭帮的粮行、

钱庄、茶叶、绸缎布匹、杂货食品等资本雄厚的大型商号，多数建立在这一带。

“铁打的小东关”。这条街在东关越河圈的东面偏北。有当铺，如：“正立当”、“协和当”、“兴聚当”。这几家当铺，都是资东富有，多财善贾。有高唐郝家经营的，也有山西字号。当铺都是崇楼巨厦，高垣峻屋。街的东西两头，筑有阁门。街四围圩墙坚固。为防盗防火，日夜巡逻，警戒森严，因此以“铁打的”来形容。

那时，从运河装来的货，如江浙皖等省的糖、茶、海味、纸张、工业原料，闽赣等省的磁器、夏布等，都到聊城东关“大码头”或“小码头”卸货。本地土产如乌枣、槐米、贡麦、大头菜等货物，运往南方，也在这里上船。这样，装船卸船，货如流水般在此集散，天天热闹非常。“大码头”成为聊城八景之一

的”崇武连樯”，因为这个“崇武驿”既是船坞，又是商港。站到大码头台阶上，南北望去，只见运河中，波浪滚滚，汹涌北流，那粮船、货船的帆樯连绵不断。

崇武驿“大码头”为什么装卸货物这么繁忙呢？这个码头不光聊城商品在此处装卸，连周围邻县如：临清、茌、博、高、夏、冠、阳等地的商品，也都集中到聊城来装卸。因为这里有一座“免税碑”，为清朝康熙皇帝圣旨特许，凡在聊城装卸商品，一律免税收。有这样好处，谁不想省钱？据碑文记载：清康熙四十二年，圣驾南巡，回蹕经东昌，邑人任克溥奏请皇帝“体恤商艰”，免除征税，得到批准。任克溥，字海眉，曾任刑部侍郎，后加尚书衔。那年，他已致仕（退休）回家了，给乡邦做了件好事。那座碑楼，民国后还巍然屹立于运河东岸，以后不知踪迹，想被人毁坏了。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外籍客商在聊城，经营各种生意，十分活跃。光山、陕两地商人，他们创办的大型商号如：“行日章”、“刘兴隆”，“行晋升”、“玉盛号”等五、六十家，中小型的为数更多。他们经营的行业多种多样，有金店、银号、药铺、染坊、书店、笔庄、茶庄、杂货行、南纸、旅店等无所不有。那时，山陕人开设的大小旅店就有二、三十家，常在此留驻的客人在千人以上。至于其他省如浙江、皖赣等省，也设立不少商号，可与山陕客商并驾齐驱。这些外籍客商，落户于聊城，都有他们的会馆。会馆中石碑，刊载这些商号名称，是很详细的。从商号捐银的数目，可以推测出每一商号规模的大小。

二、行会组织

行会的名称，从历史上查考，远在隋唐时代已有著录。行，是经营的专门业务。如木

材、铁器、杂货、布匹，称木行、铁行……凡是干同类生意的，便称为同行。同行多了，相互间有团结互助的必要，于是成立了所谓的“行会”的组织。以后的“同业公会”，便是由行会演变来的，不过，组织较有规章系统而已。过去，所谓三百六十行，也不是恰恰此数，三百六十行中，也并不是全为干生意买卖的。如“庄稼人”（务农）也算一行，“乞丐”也算一行。这“行”字的意义就无形中推而广之了。“会”，是由“行”而产生的群众组织，多以义气感召，自发形成。他们既有领袖（称为“帮头”或“首事”），也有行规，其纪律、法度、相当严整，并都能遵守。

聊城，可以说哪一种行业都有这类行会组织。比较大的象色纸染坊业，建立了有如会馆形式的“色纸公所”（在东关太平街路南，供葛仙翁、殿宇、院落也颇广阔）；金融业也有

“钱业公所”（在东关旧米市街路西）；理发业逢到该业“祖师”（罗祖）诞辰或集会议事，全体聚会于东关龙王庙（在闸口东越河圈路北）；木匠业的集会和宴聚，也都来龙王庙，因庙中正殿供有鲁班的神像；毛笔业和印书业工人，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集会地在城内王家园东一座财神庙内。至于其他行业，也都有其固定的或临时借用的酬神议事之所。还有非商业性质、只凭力气混饭吃的劳苦群众，如“脚行班”（搬运、装卸工人）推车、抬轿、拉洋车、当短工，这些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行会组织。但有的有完整的系统、规章，有的比较散漫，只是遇事临时召集。行会在聊城俗称为“帮”或“班”，较大商号则称“同行”。有时，为了商品的议价、或调整同行中某些规定，就来一次“斋行”，借一座神庙唱戏、宴会，贴出了“同行公议”的招贴（广

告），公布于社会，同时具呈当地政府备案。

民国初年，聊城就有了“商会”。原始地点似在东关大街路北。至于历任会长姓名，只知道在民国二十年前后，会长是胡芝庭（兰台），后来为程雪舫。商会也由东关移至城内楼东大街路南。那时的商会机构不大，只有会长、挂名理事、师爷（文书）、账房（会计）、工友等，统统不到十个人。由于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发展，商业逐渐兴隆，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政府根据上峰法令指示，着手让地方上较露头角的工商业者，也即所谓半绅半商的先生们，成立商会。商会的组织性能，从官方看：一、可统一领导，明了各行业的商业活动及其经商伸缩状况；二、加强对商业的监督指导，图谋地方工商业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三、有利于协助政府征收课税，下达摊派科敛；四、用以调解商业间种种纠纷，减轻地方

政府的压力。若从商界的民众组织来看，商会也可起到以下几点作用：一、代表全体商业户，对抗政府不合理的课征；二、以地方商业集体名义，向政府提出有利民众的建议，或请求废止某种弊政；三、代表一县工商集团，向县以上的官署作某种要求或抗议；四、扶植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如私营电灯公司、长途客运等），为小型商户解决困难。

民国后，聊城地方工商业虽不如从前“火爆”，但是还可维持小康状态。商会成立后，不论客籍土著，凡大一点的商号，一律要参加。中小型商铺、理发、饭馆等行业，都没吸收。凡参加的商号，只在该店门面柱子上，挂上一个统一印制的、蓝地白字，上有“商会”二字的约长二十公分的长方形铁牌，作为标志，每月要缴会费一角。商会中凡列职衔的首要人物，也多为几家大字号的财东、经理之

流。一年中很少开过会员大会，但每月印有开销账单分送各商号。

聊城县的工商界，在过去，其经营成就，特殊产品创造，颇著信誉。至于近代，聊城地方工商业在适应潮流、辅佐文教、启迪民智方面，也发生过一定的作用。如：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爆发，聊城商界由蒋宝荣先生（字光甫，回族，即善于排难解纷的蒋二爷）倡导发动，协同聊城三师、二中、道立小学等学校师生三千余人，组织了“聊城商学联合会”，积极展开了反帝爱国运动，游行示威，声势浩大。

九·一八后，日寇强占我东北三省。我国三千万同胞，饱受日本帝国强盗的残杀淫掠。东北人民不甘受日本鬼子的奴役压迫，纷纷组织义勇军，与敌人搏斗拚杀。国内人民莫不踊跃支援，输送武器、金钱，鼓励东北抗日爱国

的义勇军将士，奋勇杀敌，收复失地。那时，聊城县工商界也都不甘落后，大力捐献输将，积极支援东北抗敌将士。全城商号抵制日货，互相监督，誓不销售日货，并分组在街上演讲宣传。当时，聊城反日空气高涨，与全体工商业坚决抵制日货的统一行动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三年，津浦铁路将修筑由济南到聊城的支线。消息发表后，临清县向有关部门争取改道临清，聊城人民各界由工商业首先号召“力争铁路”运动，选派团体代表周荫泉等赴济南等地交涉，在济邀请新闻界座谈，发表正确主张，终于得到胜利，当时由铁道部决定了“济聊线”执行施工。后来，路基已基本完成，因抗日战争爆发停止。以上说明了聊城工商界，在过去时代，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与促进公共事业进展，有一定的贡献和成绩，并在当时的津、济各报有较详细登载。

三、商业区域分布梗概：

漕运停止后，运河中商船往来，南北物资交流的联系未断，但已不如以前兴旺了。聊城的商业，因未遭遇重大战争和灾害，大致还可维持。其市场分布区域及某些行业集中经营的梗概，略如下述：

商业店铺，虽是行业不同，但物以类聚，它们自动依附于一个易于活动的有利环境来经营。百多年来，聊城城关旧貌，毫无改变。商业繁华区，城内、东关，各占一部分。城内，以光岳楼为中心枢纽，向四外辐射，辟为四条通衢。以方向命名，称为楼东大街、楼西大街、楼南大街、楼北大街，地方人简称楼东、楼西、楼南、楼北。楼西大街因为邻近县衙（先称县公署、后称县政府），打官司的，完粮的，终年热闹，所以，这里大小饭庄林立，比别的街上多。但也有其他店铺，如粮店、酱

园等。楼东大街，是个商业繁华区，这里可以说是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前门、大栅栏。从清代到民国后的抗日战争前，这条长达二华里的楼东，大型商号鳞次栉比，装饰辉煌，熙熙攘攘，行人如织。如上海的商务、中华、世界等书局的发行所，地方的几家大书店，都设在楼东。金店、银号、绸缎布匹、洋广百货、农工银行、裕鲁分当，这些较大资本家的商号，也都设立在楼东。一九二六年后，聊城市区已有了电灯，入夜，楼东大街电灯耀目，人群热闹，很显出繁荣绚丽色彩。那时，凡是楼东大街的商家，差不多都装上电灯了，象一间门头的小理发店、小杂货铺之类，楼东是没有的。楼东除了这些资金雄厚，豪富的大商号外，公家机关只有两处，即“东昌邮局”和“聊城县警察局”（北伐后改为公安局）。旧时代的聊城，楼东大街虽称得上市区繁华所在，但商界

的建筑物，并不怎样高大雄巍。铺面一律是较敞亮的瓦房。一九二一年，楼东大街路北，才有了两座现代装饰的楼房，那就是“中华书局”和“太平公司”。

出东门再往南，又一座城门，俗称“拗头门”，是作为军事防御用的。两个城门中间叫“瓮圈”。这“瓮圈”中，也有一二十家商号，有南纸账簿、西药房、澡塘、糖果、笔墨文具、书铺等。东城门外，向南就是护城河边，西靠城墙，即所谓“东门口”。这一拉溜空旷地带，有两处大企业，即“森林木厂”和“聊城电灯公司”。这个东门口，每年春节后，从新正初一，到元宵灯节，犹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那样热闹。摇茶碗的，说评书的，打洋琴的，拉洋片的，摇山梨粘的，变戏法的以及压黑红板、套烟卷、转娃娃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还有卖零吃的担子、摊子、布棚，

一个挨一个，豆腐脑、茶汤、凉粉、枣饼、切糕、包子、馄饨、煮得稀瘫稀甜的红薯……真是人如潮涌，男男女女，拥挤不堪。“逛东门口”是一年中妇女们难得的几天享受。可是过了正月十五，这地方一变而为寂寥冷静，除了电灯公司的机器响动外，几天前那哄哄闹闹嘈杂火爆的景况，一点见不到了。

东门口拐弯北来，转而向东，迎面一座高台，筑于街衢中央，这就是有名的“鲁仲连台”。车马行人，进城出城，这里是必由之路。过了鲁仲连台，东望是笔直修整，长达五华里的东关大街。南北店铺，阗阗衔接，建筑整齐。中药店的冲天招牌，耸立云霄，鞋店、布庄、巨幅市招高飘当空。驴市口一带，杂货行、茶庄，多是资本雄厚、整批加零售的大字号。这一条东关大街，也是商业汇集、百行杂陈、殷实富庶的区域，可比作济南的商埠，苏

州的阊门外，车水马龙，行人如鲫。整个大街青石铺路，南北店铺，都有前出的厦檐，下雨时，行人从厦檐下边走，是不挨淋的。各家字号的匾额、招牌，一般为黑漆金字，光耀灿烂，雄劲大方，多是名人手笔。清末邑人朱学笃、马镇、傅淦，民国后刘志岑、顾绍年等书法家的墨迹随处可见。

驴市口向北，是礼拜寺街，向南是旧米市街。口，是十字交叉的所谓“隅首”。口的四个角间，有酱牛肉、酱羊肉、卤煮鸡、扒鸡等担子，是固定在此的。他们都是附近的回族，制做的肉类肴品，清洁味美，颇有声名。也零卖生牛羊肉，每天顾客络绎，一到过午，都卖光了。

旧米市街是很长的一条南北街，是通往外乡的主要渠道。南去是龙湾，可达七级、阿城、张秋等几个大镇店。街上设有几十家粮

店，规模都不小，是市内粮食生意的一个集中地。除米市街外，楼西大街、楼北大街、东关闸口东的粮食市街，也是粮店汇聚的地方，因为适应四乡粮食进城的需要，经营于不同地点。旧米市街和楼北大街，还有很多家旅店，大小不一。

聊城“怀德堂”药店

朋 南

一、怀德堂总店及其分号

建国前，聊城城关有十多家中药店，如：太元堂、保和堂、同德堂、同育堂、济春堂等。其中有两家规模较大的，就是“怀德堂”和“益寿堂”。

“怀德堂”和“益寿堂”都是陕西人经营的。怀德堂的财东是郗敬安，经理郗子书。这座药铺设在东关大街川廊西，坐南朝北，三间门脸，布置得气魄庄严，蔚然可观。厦檐下除挂有四块长达两米的金字招牌外，门外还竖有高耸房脊以上的“冲天招牌”，上写大字一行是：“陕西怀德堂川广云贵生熟地道药材”。这种“冲天招牌”，是药铺的特有标帜，如北

京同仁堂、济南宏济堂、杭州胡庆余堂，聊城的其他家药铺等，都是这样。怀德堂规模较大，药房占地北临东关大街，向南直达丁家坑，连楼房、仓库、宿舍等不下一二百间。职工一百多人，设有专人在家接待顾客，专人跑外采购进货，而且货品齐全，应有尽有，药材地道，货真价实，是鲁西一带享有信誉的一大药店。

怀德堂设在东关大街的门市部，专接方抓药，并零卖成药。旧米市街还有药栈，存储大量货品，批发给外地客贩。本城及乡镇、部分小药铺，也多为怀德堂的主顾，供货及时，不使缺乏。因为怀德堂货品质量好，价格公平，得到同行信任，故而营业额很是可观。东家郝敬安多财善贾，声气广通。除聊城怀德堂总店外，在临清还设立一个分号，规模也不小，委派郝广太、刘茂昌为经理，主持业务。总店规

定，每年腊月二十以后，临清的两位经理，把账册送来，将全年营业额归入聊城怀德堂总店结算。虽是“统一核算”，但总店、分号，盈亏明确后，“分红”是有差别的，对经理和从业人员，也有升降不同的待遇。

怀德堂，还兼营一处“宗久德银粉局”，附设在药铺之内。银粉是妇女擦面化装的香粉。原料由铅质炮制，另加香料调配而成。粉质洁白细腻，芬芳柔润，搽到脸上，粉黛生辉，玉容焕发。尤其逢到有嫁娶、添箱等喜事，银粉更是不可缺少之物。那时，舶来的化妆品，市场少见，所以这类“银粉”销路很广。银粉装在长方型小纸盒里，外用木版印制的一层纸封裹上有红线条刻的“鸾凤银粉”四字及宗久德店名。宗久德银粉局，当时为聊城独家，经营多年以后，乡镇才有仿造。

怀德堂，在济南还设有两处生意，都算是

分号。一是估衣市街路南的××药栈，一是普利门内××南纸庄。这些附设对怀德堂来说，在资金周转，扩大生意方面，是大有帮助的。

二、药剂配制及规章制度

怀德堂之所以名声大，买卖做得响，除资金雄厚，财源亨通外，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它始终坚持“货真价实”。它从外地购进药材和进栈后的处置，严格地执行以下几项原则：

（一）购货地道，不贪图价低而收次品，如地黄、山药，采取怀庆府所产；川军、黄莲，以蜀地为上。贵重药材如麝香、珍珠、人参等，也是选取真品，辨别其适应性能，方可购进。

（二）货入仓库后，存储药材绝对避免受潮受热，严防霉污。更要防止鼠啮虫蚀，药物变质。如发现有部分变质药材，立时剔除焚毁，绝不贬值，卖于客贩。（三）批发及门市售价与本市同业家一样，绝不因进货价昂而提高。

认真执行上述规章，一丝不苟，童叟无欺。天长日久，自然地赢得社会群众、同业客贩的称赞和信赖。于是，无论批发或零售，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怀德堂对于药材加工处理非常认真。生熟药材整批进货之后，继之就是使这些东西达到物尽其用，发挥性能，要按一定工序来“遵古炮制”。该炙、该炒、该蒸、该晒，应配佐什么辅导品，使它微妙融合，起到应有作用。这些加工过程，复杂、繁琐，而又合理。这是祖国历代劳动人民长期地与疾病作斗争，从实践经验中，得到的宝贵经验，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传统技术，值得重视和改进。怀德堂的药材，能继承历代相传确实有效的古法，对每一种药物，都十分负责，认真加工，所以能使广大群众信得过，都称赞“怀德堂的药好”。

加工后发到门市零售的药，也要分别处

理。易于受潮、融解的药，或较贵重的药，都要贮藏于瓷罐中，密封不使漏气。用时现取，取后小心地再盖好封闭。应装药斗（架上盛药的抽屉）的，未装之前，要逐一筛选，剔除其杂质、异物，对已加工之成品，还订有随时检查的严格手续。对零售或批发的膏、丹、丸、散等成药，在整个配制过程中，不是只委派一个人去操作，而是经过两人至三人反复检查和极端审慎地监督。例如：要配制一料药丸子，不论数量多少，甚至只是一个来单委做，数量极少，也丝毫不能马虎从事。至于本店整批地大量地配制，更是如此。（一）先由学徒把方中每味药一一称好；（二）请经验丰富的职员验看，称出分量是否准确，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数目品种和原方有无差错，逐一仔细核实后，再把全套的药分别加工。碾碎、磨细、过罗或用蜜、用水、用其他融化液体，初步混

合掺兑齐匀，成为半成品。进行这些工序时，也要逐一检查，做到丝毫不误，否则，一有疏忽讹误，影响疗效甚至关系人命，焉能儿戏？我们常见药铺里有这样一幅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意思是说：“要凭良心感召，必须重视责任，才于心无愧”。如果是配制丸剂，把配佐揉和均匀，搓捻使其成为一般粗细的条形后，下一步就是用手搏捻为丸了。这是成品最后定型的一关。既要粒儿圆，又要个儿匀，绝不容许大小不一。因为丸剂配合好的总量，应出多少粒是有规定标准的，不能随意增减。病人服用时，按方笺规定服用多少，关系着每个人的症候，直接影响疗效，非同小可。搓药丸子，是店中例规，上至经理，下至学徒，大家一齐干。夜晚，在灯烛之下，大工房里，百多人动手，搓、捻、搏，生产出大批药丸。每一组应搓多少，有发料，有验

收。怀德堂货品倾销量大，要保持供应不缺，因而，常是天天晚上，有这种集体操作赶制丸药的情况。据说：“打夜烛”干活，柜上备有香茶，并有一顿丰富的夜餐。从此可以看出，他们在经营管理上是有一套周密办法的。

三、门市零售成药及据方抓药规则

门市上零售的成品药，膏、丹、丸、散，液体类各种药酒，固体类各样药锭，不必拿单子就可抓取的小单方，合计八九百种之多。应付这么广泛的主顾，并使每个顾客都满意，这确乎不简单。怀德堂的全体人员，都经过长时期的严格训练。站柜台应酬买卖，要做到处处周全，面面俱到，一丝不漏。先从抓药说起，顾客交了药单后（医生的处方笺俗称“药单”），先审查一遍，随即拿小戒尺压着一角，摆到柜台上。接着两个人就单抓药，每味各包，用毛笔在包上写上药名。全单抓齐，两

人持包核对后，再统一包起。如果单中有需用布包的药（如车前子等），有个别煎后汤剂冲服的药面，或者应分先后下锅的药，都必须注明，并同时详告顾客。假如药单中有一味不常用的药，而店中恰恰缺少，必立即暗示同人，速速去同业家购买，但绝不能叫顾客知道。倘叫外人知你药味不全，就会影响药铺的信誉。缺药的现象，对怀德堂来说，实为少见。单中每一味药，应严格据单照付，不能欺瞒病家，而以次顶好，或以类似代替，或同名而产地各异，蒙混充数，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一个单子抓齐，把药包好后，按单核算价格，把这个单的应付钱数，用暗码写在药单的背面，以备再来抓药时有底。那时，药铺的每味药零抓价格，并不十分统一，他们写的暗码，外人看不懂，店中人一看即知。

凡是开药铺的人，都懂点医学知识。对平

日常见病，应吃什么成药或单方，必须略知一二。因而，民间俗谚：“干几年药铺，就可捐成半个大夫了。”那时，不只怀德堂，象聊城几家大药铺中人员，均懂点医学知识。因为部分上门买成药的人，往往闹不清买什么好，来店现问：“我家孩子闹肚子，吃点什么药呀？”

“你看看我这两眼发红，净流泪，睁不开，怎么治呢？”“腿上长了个疮，买点药罢。”象这样的顾客，无异于到医院求诊的病患者，药铺人员就必须当他们的临时顾问，不大要紧的病，就立时予以适当解决，对症下药。成药中象内、外、妇、婴等不同的膏丹丸散是应有所备的。但是当这个顾问，也并不是那末容易。譬如：他说闹眼，你必得看一下是否暴发的火眼，抑或云翳。他说长疮，是什么情状？红肿剧疼呢，平塌的阴疽呢？该给哪类药，现成的处方也要记得几个，以便对症下药。如遇疑难

重症，那只好叫他去找大夫了。以上所说，是大药铺里站柜台的人员应有的知识。

怀德堂门头三大间，是旧式的板搭门。晚上，把板搭一扇扇上上，闭门很晚。掌灯两个钟头后，才上锁睡觉。夜间，非有急紧事件，是不准开门的。但门板上特辟一个小门，直径不过一尺。如果深更半夜，敲门抓药，那就从这扇小门洞里递送。象产后应服的“生化汤”，常常有深夜喊开小门来抓药的。经常抓的汤剂，如生化汤、八珍益母汤、大败毒小败毒等。为了怕遗忘，都是抄写在柜台上放的几段戒尺之下，就是初到学徒，也可立即照方付药。学徒和低级职员都是睡在紧靠门板的柜台上，黑夜里敲门的马上就醒，及时抓药，绝不误事。

聊城城关十多家药铺，有的本人就是中医大夫，自营药铺；有的是聘请一位大夫，长期住在店里应门诊或出诊。但怀德堂没聘请过大

夫，因为声誉好，讲信用，有百多年的传统作风，因而每天顾客盈门，每天下午，柜台上抓药的单子，应接不暇。该店虽没专门聘请大夫，每年三节，都向城关几位有名气的中医师送一份节敬，三十至五十元。因为每天接受他们不少的抓药方笺，要有所表示，并希望继续照顾。

四、店中职工服务规矩及生活情况

旧时代商号店铺，从业人员的“职称”和今天有所不同。那时候做生意，创字号，往外拿钱投资的称为“财东”或“资东”。几人或多人凑钱做生意，为股份买卖，拿钱的人叫“股东”。财东或股东，统称为“东家”。东家拿钱，不一定亲自参加经管，可委派一位企业负责人，去全权经营和管理，这个人称为“经理”，俗称“掌柜的”（南方叫“老板”）。掌柜的多为两个，一正一副。掌柜的，也有参加投资的。掌柜的在字号中是一个无尚权威

者。他上承财东们的旨意或公共决议，下临整体事业，去开展业务，调度人事，解除难题。经理因时制宜，适应形势，有对本店业务扩展或退缩之权。对所属职工，有论功提擢或因错责罚、辞退之权。但是，经理须对本行业相当熟练，精通业务，掌握全局，洞晓市场情况，交际广泛，信息灵通。更须有魄力，有策略，大公无私，善于驭众。不够这些条件，做不好，也难得东家的信赖，必须撤换或降低职位。象怀德堂、益寿堂，外地的许多大字号，实行这样传统办法。至与规模不大或自己经营的那类买卖，就谈不到这些了。

怀德堂的东家、掌柜的都是陕西人。山、陕两省的字号，对做买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一向是很讲究，很认真的。所用职工，也都是从陕西老家找来的。无论学徒、伙计，规定三年回一次家，可在家住半年。假期内工资照发，

一切福利全有，并报销往返川资。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职工”两字，是现在的名称。从前，经理以下，一般的从业人员，职位较高能顶事的，称为“伙计”。伙计，也有等次。大伙计相当于副经理以下的地位，但必须是在柜上靠过多年，资望较高，对业务有一定水平，东家信得过的。经过长期的考验，就有进升经理或副经理之望。大伙计以下次一等的，也就是办事经验少，资历较浅，除干专业对内操作外，别无所长，这就是二伙计。大伙计、二伙计没有什么明确规定，只是在工资上、分红上有差别而已。“伙计”二字，似乎含有专供驱使的低贱之意，可是在那时的大型商号里，是颇有些地位的。不过，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这“伙计”两字，却习惯地成为一个谐漫而随便的称呼了。

会计，称为“先生”，全称是“管帐

先生”。谐谑者简呼“帐先”。学员叫“学徒”，也叫“学买卖的”。在学徒还没熬到伙计之前，柜上人多喊“相公”。如张相公、李相公。相公两字，是旧时代对少年男孩的普通称呼。由于时代变迁，如今称为“学员”，伙计也改称“店员”、“职工”了。怀德堂对学生生意的相公，无论是新来的，或原有的，规定要施以严格训练：每天扫除店内外，使其整洁卫生。站柜台学习业务知识，到工房（车间）学习药材的加工技术，必须全套地一一学会，力求手法熟练，操作自如。在前边柜上，则学习：（一）货架药斗（抽屉）中、全部药物都要熟悉。哪种药丸在什么地方，哪样丸药的说明书挂在第几行，就是黑夜没灯，也能很准确地摸到，并对几百份说明书内容，全能背诵出来。（二）所谓“站柜台”，就是立在柜台的后面，应酬顾客。规定不能任意坐下，更不

允许交头接耳闲谈。至于看闲书，尤在严禁之列。对接单抓药，更要细心慎重。对顾客，和颜悦色，有问必答，绝不允许有不耐烦的态度。假使与顾客发生争吵，那就有遣送回家之险。（三）每天晚上，每个相公，要写仿，练习书法。一定写出大仿两盘，小仿一盘。柜上存有各种碑帖，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米芾等历代书法家的各种碑帖，由你选择，用心临摹。由经理们天天批改，有奖有罚，不许敷衍塞责。还有：每晚会计煞帐时，每个相公要跟着打流水，一个人一个算盘，三指拨珠，反复练习，达到迅速而准确。再就是誊信稿，每天发出的信件和外来的信件，必须照原信内容，誊录到一个本子上，工笔正楷，不准草率。这项工作，由相公们挨次轮流担任。（四）相公从进怀德堂之日起，要一样样学习上面所说的那些课程，此外，还要跟先生

学算账。当时全是用的老式账，但其中收支汇总和新式簿记的借贷原理，虽形式略异，而意义相同。相公们边学边协助先生管账，达到全部能承担这项工作，就交他正式当会计二年。期满移交另一相公接手。（五）新学生意的相公入号后，每晚睡在前边门市部的柜台上。也有在柜台下现支木板睡的。无论冬天夏天，都是这样。如有新到的相公，那就顶替下一个原在柜台上的去睡木板，新来的去睡柜台。这样更替递补，睡木板再升就可以有固定的床位了。还有，陕西号生意，全用家乡人，不用当地人。如果有伙计或相公在当地私下娶妇，就必被辞退。这是“铺规”。怀德堂定有严格的“铺规”，一条条写在白漆木板上，挂在柜房之内，做为约束工人的金科玉律，谁也不能违犯。另有管理厨房的一套规章，挂在厨房灶王像旁边，这些饮食调剂、卫生检查及防火防

盗等条例，要求全体人员严格遵守，认真执行。

怀德堂由于严格实施，培植学徒的规章制度，多少年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会经营善管理的专业人才。人们说：“凡是怀德堂出来的人员，个个都是全面手，个个都有当经理的资格。”怀德堂不惜一切工本，培植专业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可靠班底，是具有企业家的战略眼光的。凡是聊城上年纪的人，尤其和药铺常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怀德堂的人员，出店办事对人谦和有礼；去药铺抓药的人，也都敬茶敬烟，十分客气，从没有过怠慢客人，不予理睬的表现。这是受过磨练，经过考核的结果。怀德堂，对伙计，对学徒，虽是店规苛刻，要求严格，但待遇上，并不吝啬，每个人的薪津（工资）不低于年终应分的“花红”（营业盈余应给工人的利润），均按规定办理，绝不食言。平时在膳食上，山陕两省的人均很讲究。

对伙食，更是多种多样，弄出许多不同口味的品种，为别省别地所无。山陕人对“醋”特殊爱好。怀德堂厨房用醋，都是自己酿造。用料和制法与本地不同，造出来的醋，芳烈味醇，似有独得之秘。夏天里喝凉面或是秋冬喝温面，喝卤面，现下现盛，喝一碗下一碗，有几个人就下几碗，对此是有些讲究的。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其对伙食的精心管理而已。

五、怀德堂过春节时的礼节、文娱活动

逢到年关（春节），厨房从腊月初一日，就开列出年前的菜单，挂在房外。注明每天菜谱，保证在半个月中不会重复。至于过新年的肴馔及筵席，准备更要充分了。年前办的事是：“收拢外欠，核算盈亏”；“连同外地分号营业账册，总算大帐”。每年年终的“算大帐”，都铺排得十分隆重。三张八仙桌连接，红毡铺衬，椅搭案围，一律红缎缝制。大厅内

挂上红色棉帘，炉火熊熊，满屋生春，红烛辉煌，灿烂夺目。大帐到除夕之前，大致靠拢，基本结束，到新正初三，由经理向全号人员正式公布。在算帐之前，先“盘货”。年终盘货，有个规定：一是门市部药斗中的散药和货架上的零药不盘，一是本年开市时，所存货品要求顶起原数（如原有某药几篓、某药几箱，这次所存量不缺少），这样，有个名堂，叫“盘肥不盘瘦”，是旧时代商号一惯作风。这种办法，于事业的资金积累扩大生产，是个有力措施，但在那个时代，肥了财东，苦了职工，现在看来是个剥削行为。当时却普遍视为当然。在盘货、算帐，整理内外，打扫房屋，检查卫生，准备过年种种布置，一切就绪之后，也就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除夕了。

大年三十这一晚上，厨房里预备下几十桌丰盛的筵席，多是四大件鱼翅全席。并在财神

像座前，摆上供馐、元宝，点燃上料香神烛，烟雾缭绕，灯火辉煌。经理和全号职工，都穿上节日的服装，有的经理还穿上靴帽蓝衫，清代官服，一起聚集在财神座前，由经理带领向财神叩头。燃香点烛酹酒，必恭必敬。同时，万头鞭炮齐鸣，震天动地，仪式严肃而隆重，似乎在这神秘庄严的气氛中，这位增福财神如在其上。这是商号中的除夕“敬财神”大典，全店人员必须一律参加。

敬神后，就是拜年，即辞旧岁，贺新年，祝颂来年福寿康宁，百事顺妥之意。大厅里铺的红地毯，几只宫灯光耀射目。拜年仪式开始，经理一人站在左边，全店的职工站在右边，百多职工齐向经理叩头，经理一人同时向这些职工叩头。次之轮到副经理；也是同样。然后同事们双人对拜，互贺新年。喧哗热闹，喜气洋洋。一阵欢笑融谐的场面过去，那边已

经把宴席摆好，经理就招呼：“大家入座”，“大家入座。”这时，已是午夜后的下一点了。

除夕这一顿“辞年酒”，怀德堂上上下下的伙计、学徒，都要团团坐席，不分尊卑。而且当经理的要执壶斟酒，并客气地向全体职工道辞年之话，如说“大家辛苦一年，出力不少，今日要痛快地喝几杯呀”等等“拜年话”。喝完酒，吃了水饺，天也就快明了。撤席后，经理就分派应办的事：一是“亮门”；二是派相公们分几路送“贺年片”；三是除留少数人看铺，统统赴山陕会馆举行“团拜”。这三件事都在年初一的早晨举行，大致情况是这样：“亮门”，天将拂晓，三大间板搭一律打开，里里外外灯火辉煌，布置一新。门柱上、门框上，都贴上了大红春联。丹艳丽金，令人悦目。柜台里十几个照应门市的店员，新衣新帽，春风满面。今天来抓药的或买什么成药的，头一份

买卖是不讨价的，顾客愿给几个就给几个，不许计较。包药的纸，从初一到十五，都是红色，取吉利之意，也表示让病患者新春迎喜，早日健康。在亮门后，有些街上的“混混儿”，专吃这一口的，来到门前“念喜歌”，一起又一起。事前必须准备好，到时一一地开赏。他们的“喜歌”，是顺口溜式的几句吉祥话，由一个人高声喊唱，几个人跟着喊好。一大群孩子们，随着看热闹，也好啊好的跟着喊。今把喜歌抄录一例如下：

礼花一响把门开，好！
明灯蜡烛掌起来，好！
珍珠玛瑙堆成垛，好！
金银财宝满屋排，好！
天官赐福交旺运，好！
五路财神送宝来，好！
怀德堂去年买卖就是好，好！

今年掌柜的更发财，好！

开市大吉、大利、大家乐，好！

唱个喜歌开心怀呀！好！好！

好！

“亮门”最多的也就是两个钟头，又迅速地把门板上上，不再开了。一直到初六日，才正式地开门营业。这新正初一“亮门”，别家大型商号也都一样。那时有一帮专门念喜歌，混这个赏钱的，他们挨家去念，转悠一阵子，每人都落个两吊三吊的，回家误不了吃早饭。

再说送贺年片，这是用上等梅红裁就长六寸宽三寸的纸片，木刻印上“怀德堂”三个大字于片子的正中。青年学徒穿上长袍马褂，携着一大罗走街串巷，往各个商号分送。这天，谁家也不开门，但不喊门，从门缝中塞过去就行了。后来，贺年片多为石印的，除字号外，又加上“恭贺新禧”字样。个人的名片年初一

也是当贺年片用。这一天，街上分外热闹，除了男男女女拜年的，买卖铺户撒片子的来往不绝，大街小巷一片道福恭喜之声。贺年片除了向本城的来往商号分送，也向外埠各地素有交易关系的商号邮寄。

去山陕会馆举行“团拜”，必须赶早。在天不明之前，掌柜的穿好过年新衣，由学徒打着灯笼引路，都上会馆里来。一路上灯烛明亮，络绎不绝。（在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聊城的山、陕两省字号，还有百多家。这座为两省客商所建，用来宴会、议事的“山陕会馆”，至今还完整无损）。新正元旦的拂晓，会馆中到处宫灯高悬，光耀眩目。大殿里布置得庄严富丽，关帝座前，陈列着铜铸造的高达丈余的五供（香炉、烛台）巨烛，火焰熊熊，檀馨芬漫。在这里聚齐了老老少少的山陕乡亲，济济一堂。三四百人，在热烈欢笑的融洽气氛

里，举行团拜。而后，酒筵摆好，全体入座畅饮。这时，戏台上锣鼓喧天，又开戏了。

在敬神典礼时，那一挂鞭炮五万头，响起来两个钟头。关帝像前那对大蜡烛，从除夕点起，有专管“掌蜡”的工人，要一个月不灭。

关于那时的“山陕会馆”，这座民族传统形式的古建筑，据资料考证，从创建到今天（一七四三—一九八四年）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悠久历史。据说：旧时，山门外有雕琢精致的一道石栏杆，两旁石座上，竖有高耸霄汉的一对旗杆，三座大殿，九九八十一间。每座大殿的内外木石铜柱共九十根。柱子下础石，有石狮、石象等，刻工精巧，栩栩如生。这九十根柱石的动物石型，在过新年时，都蒙上铜制的外壳。更显得光辉灿烂，形象逼真。每座大殿中，南、北墙上，挂有巨幅国画，镶以玻璃、檀木作框，典雅瑰丽，大方壮观。陈设的

桌、椅、几、凳、书案、画屏之类，都是红木制造，浑实光泽。整个环境，肃穆庄严，气势巍峨。三座大殿都是朱红隔扇，可闭可启。殿内和檐下，一块块匾额，多为名人手书，有数百方之多。。

以上所述怀德堂的情况，只是个大概，不够详尽，也不够完整系统。关于该商号其他方面可以叙述的事情，还有不少。如：劳资之间的纠纷和调协一致的稳定局面，药材发行和向外地采购的行动方法，产品中较有声誉的药物种类以及历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兴隆时期，衰落时期，人物动态，社会反映等等。都需要另列篇章。这里暂不记述，待进一步整理后，再作续篇。

聊城(解放前)粮食业及其“脚行班”

史墨香、吴云涛

聊城粮食业以往概况

一、聊城粮食业的组织情况及其性质

号称鲁西重镇水陆码头的东昌府，过去曾有其相当长久的繁盛时期。清代中叶漕运畅通，这里工商业发达，社会间各类行业，都呈现一派蓬勃兴旺的状态。而粮食行业，更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经营。它为民食问题，中间起着余粟交易，代理买卖等作用，也就是所谓“经纪人”。这种粮食行业，从清代至民国，以至解放前，聊城城关、乡镇普遍设立。大自具有雄厚资金的巨型字号、小至逢集“拉卜罗”的“斗户”。大小不一而足。

干粮行这一业，无论其规模大小，应具备

的主要条件是人缘熟，拉拢大。你开铺营业后，因为认得人多，尤其农业户多所熟识，余果双方都来捧场，那么就门庭若市，生意可逐步扩大发展。更重要的是手下养着几个长期贩子，他们终年车载驴驼倒蹬粮食，日日年年为你招财进宝，犖运银钱。（所谓“养着”是对贩子拉拢靠近，使他长期的照顾你店，可能时要多给他点便宜。）所以开粮行要手面豁敞，眼界较广为第一原则，其次才说到资金多少及经营办法。

组织方式有集体经营和个人单干。前者规模大，人员多，帐目出入和职工安排，似乎正规。如东关的“奎兴”、“聚祥”、“协和”。城内的“文盛”、“聚和”、“昌顺”等。这些较大的店号，他们除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外，还大宗地自营，天天观察市情，余迟果快，从中赚取利润。如果缺乏揣测行情的眼光，和投机倒

把的技巧，是难以和同业竞争的。集股生意投资者称为财东，财东只是拿出钱来到年底听取分红。很少进店跟着干活。许多财东共委派一个经理，掌握全权。由经理自行雇用职工。旧时店铺经理叫“掌柜的”（南方叫老板）职工叫“伙计”，学员叫“徒弟”。这伙计和徒弟，除经理物色外也多由股东荐送而来。其中主要脚色如“老头脑”（斛头）是由经理聘用合格人员。买卖粮食，店方各取行佣二分（即成交的全部价款中2%），东掌之间，旧历年终营业结算后，按四六分红较占多数（即除去一切开支，净余利润，归股东六成，四成由经理按每个职工出力情况，作合理的奖励，是谓“花红”）。

二、粮行从业人员的应有职能

经理人接受众财东的股金，去创立一个字号，这叫“领东”，充当这一号经理，更不是外

行人所可承担。一要业务精通，秉性忠诚为财东们所信任；二要有拉进来揉出去的操纵能力；三要有巩固营业控驭职工的一套办法。更必自己不惜劳苦，勤于访察同业状况，洞悉行情变化，以便随时采取措施。这样，才可称职使营业有所发展。

经理以下，在职工中占优越地位的，是每天执掌量数倒斗的“老头脑”。他是专管往外倒粮食，有一种熟而生巧的特殊诀窍。挟起布袋往斗里倒，粮食倾下，疾徐骤慢一瞬之间，可以瞒过常人眼目，以少充多。看着倒的确是挺冒尖的一斛，其实在倒时已轻轻使用手法，使空间存有旋涡空隙，实数是大有出入。说起来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江湖骗人伎俩，虽然也是择人而施，究竟于商人道德有所抵触。然而，

“老头脑”的本事也就在这里。他并能拉拢几个贩子，经常和店里打交道。“老头脑”薪水

高于别人，每天吃什么饭炒什么菜，连经理也得以老头脑马首是瞻。其次才属着管帐先生（会计），他负责着一份一份粮食的存放和卖出帐目，为巢户结算，向买主讨款，周转银根，应付开支。尤其在发生大宗交易时，一个主能成交百余石，“老头脑”一袋一袋地倒斛，同时高声报数。司帐先生执笔倾耳静听，并随着“老头脑”的喊声，而哦哦声诺，表示已经落笔无误。因此，大的店号，光会计就有两三人，应付每天大小不等的交易，年年的麦汛（俗称热麦市）简直忙得顾不得吃饭。

城市的居民，向熟识的粮行余三五斗粮食，不必马上付现款，也可以赊半月十几天的。因此，零星欠户多了，店里也有专门上街讨欠的伙计，这叫“跑街”。这专司跑街的，除了向零欠讨帐，同时还稍带揽点生意。但大宗交易他们还够不上接洽，必须当经理的亲自

出马。每年麦收后，城关各个酒窑子（酿酒坊）都要准备踩曲需要把小麦收进，才可施工。这踩曲备料所需小麦，也视其酒窑范围大小而自定数字。大的酒窑如“东兴和”、“集义成”、“恒升裕”等，年年要买进小麦一二百石，有的超过三百石之巨。这样大的主顾，成交后粮行可得巨额佣金。并可以预先以贱价收下整数抛出，从中捞取利润。次是一年一度的小麦旺销季节，事先各粮行经理们，势必抢向酒窑子拉拢酬酢，希望多做笔生意，可抵半年开销。

粮行其他职工，如帮助倒斛、清仓、倒库、解款、出差、打闲杂等等，都有其天天干不完的事。待遇除工资外，由店供应膳宿。大的字号伙食要较小店好一些。

三、粮栈自营方式

我们形容旧时代商人，有“多财善贾、长

袖善舞”之语。这是有道理的。如粮行这一行业，其性质本是代客买卖抽取佣金，但为了多赚钱起见，他们并不局限于只作中间经纪人，也可大做自营。譬如：有钱的囤户，有的委托粮行代为囤积大批粮食，目的是斥资居奇，待价而估。但囤之既久迟迟不见涨价。也有的个别粮行故意地压低市价，使其难得获利，这样，囤户为了等款使用，或为了抛出心切，也就忍痛少赔一点，叫店方脱手，店方就可乘机贬值把它收进，因为耳目灵通，立即可以外运外销，如临清、济南、德州等地，一转手之间从中可获不少利益。更有市面一时行情不定，也可凭锐利目光预测涨落，贱买贵卖，是谓自营。不过这种作风，易于牵动市面动荡，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

果户来粮行买粮食，不可能即时就卖出，可以指定限价，放在那里，也可暂时先借部分

钱使用。囤户把粮储存在店里，一时卖不出，也可借款。不过，以后算帐时，开出清单，有利息有栈租，还有倒仓、上垛、工力等，扣除许多项目的耗费，都得一一认帐。

另外，还有所谓“卖空囤”，这是类似挖肉补疮行为。什么叫“卖空囤”？就是粮栈里一时款紧，无法周转。就向有意囤积的有钱户兜卖粮食。双方商妥成交粮食各类和数目，交货日期。批好合同，各执一纸。其实粮栈并没现货，犹如投机市场的买空卖空一样。到期或涨或跌，双方有赚有赔，如资金微薄的粮栈，经不起亏损，往往因而倒闭。

又有所谓“偷梁换柱”法，也是一种趁空子冒险而为的勾当。如粮食市价一时高涨，粮栈可以把别人囤在本店里的粮食，不通知囤户，自行脱手，一待行情低落，再为买进抵补。这样，如弄不巧就赔累不堪，无法偿还，

有的因此而打官司。以上所说，当然是少数资金不丰厚的粮栈，较大的字号，素讲信用，这类行为甚少发现。

粮栈除了应得的规定的佣金外，另有“鸽”也是一种收入。所谓“鸽”是卖粮食倒布袋时，抛撒于斗（斛）外的粮食。一石粮食可得“鸽”二升，这也是有其常例的。积习如此，自古已然。

四、集市“斗户”和粮行行规

代客买卖的粮店（栈），城市里有，四外乡镇也有。如聊城阳谷之间的“七级”、“阿城”、“张秋”；北路和临清搭界的“梁水镇”、“康庄”；西边和堂邑接连的“沙镇”等，都是较大的村镇。其规模不亚于一座小县城。镇上都设有这类粮店，也不乏资金雄厚之家。村镇的集市，有它一定的日期，如三八、四九、二七、逢五排十等，每月逢到这个日

子，就是集场，卖什么的也有，粮食交易更不可缺。

集市上有专管代客买卖粮食的经纪，叫做“斗户”。只是拉个卜罗，摆上一只斗，便可进行收佣收“鸽”。这类“斗户”，多属于“集头”来充当。每个集可收不少的佣金和“鸽子”，是个累世相传颇为可靠的“聚宝盆”。他们干这一行，空手白捞，旱地拾鱼，并没什么营业执照，更谈不上缴纳税收。因为有这样好处，便有人覬觐眼红，打架争夺、互相对垒的事件常有演出。

关于粮食的计量方式，从古以来历代相沿，是用升、斗、斛为量器单位。十升为一斗、五斗为斛（古时是十斗为斛）。斗有方形、圆筒形两种，聊城以及附近各县，多是方形。斛的面和底都是正方形。面小而底宽。两边有柄可攥。据说这斛的制作是宋代的贾似

道设计。粮食每一斗重量，由种类不同而各异。小米是十六斤，小麦是十五斤，豆子、玉米十四斤，高粱最轻只十三斤（老秤）。斗的容量，是以县官公案上签筒为唯一标准，十八筒为一斗，各地一律，不容讹错。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度量衡改革，粮食交易也就逐渐地废斗改秤统以市斤论值了。

粮行业有“应行打差”的义务。地方军队过境，索要马麸、给养，干粮行者，必要分担输送，按价讨款，不给佣金。地方政府偶有粮食需要，也是如此。过去，同业间还没有公会组织。新的粮行开业，事先须举行“和行”，摆几桌酒席，把同业户请到吃喝一顿。算是大家承认了这一小店正式参加了同行之列。

粮食行业，也有他们的“行坎”。从一到九的数字，用别的九个字依次作代表，但虽同是

粮业，各地“行坎”并不相同。聊城城关粮食业的行坎是：“枪、亚、彦、丰、土、要、现、翘、欠”。说坎时应在每字下加一“零”字作赘词，如一元二，就说“枪亚零”，两元四（或二角四）就说“亚丰零”。余类推。这种行坎，为同行人中做交易时暗语，外人多不懂。又如其他地方，粮食业的行坎有的是：

“夏、天、春、罗、伍、交、化、分、旭”（上述每字取上部或偏旁，依次分别表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于每一个地方的粮食业，都有他们相承沿用的行坎，绝不千篇一律，更不随意杜撰。

粮食行业的宗教信仰，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崇奉一个祖师。严格地说，这个祖师或者与这一业扯不上什么关系，但该业中总要附会穿凿，找出一个英雄或历史伟人，做他们职业上想像的创造者。粮食业中，祖师是“神

农”。因为这位古代圣人、帝王，开始创造耒耜，教民稼穡，生产出五谷杂粮，人民赖以生活。粮食行业专为米麦菽稷而经营，所以把神农氏尊奉为本行业的祖师爷。除了“神农”外，还普遍供奉财神。商业铺店供的财神，并不是一般居民住户所崇拜的那位赵玄坛。而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政治家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人，越国大夫，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了吴国，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定居，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他认为民间日用百货，应当控制供求平衡，消灭剩与不足的现象，才可以稳定物价，不使波动，而影响社会秩序。他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他积累的一套经商原则，多为历代商人遵从，被尊为财神。这位陶朱公和他夫人西施的坟墓，至今还在聊城东南肥城境内。

聊城的粮食业，从清代漕运旺盛时期的兴

隆，到民国后的衰微，军阀时代的扰攘不安，日伪时期的暴虐摧残，绵延二三百年来，本城同行业不下百多家。其间崛起、停歇，不一而足。遭受风浪，也无从尽述。民国后，三十年代，由公众募资办了“聊城粮业公立小学”，算是为地方教育事业做出贡献，难能可贵。

聊城的粮食业，几百年来，由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整个形势的体制控制，其活动、经营，遵循传统相沿的规范前进。他们过去处于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渗透压迫下，处于黑暗政府苛捐杂税层层剥削之下，朝忧夕虑、艰苦挣扎，在漫长岁月中，为地方工商企业，扮演了一种脚色，表演出种种畸形繁荣与一蹶莫振的各个不同的场面。为地方商业史，留得痕迹。

聊城粮食业的“脚行班”

“脚行班”，也就是过去的“行会”、

“帮会”一类性质的组织。旧时代中，凡属以体力赚钱者，统称为“苦力”。“下苦力”也有它的组织。但和其他行会不同，没有师傅与徒弟的关系。虽有头目，他和各个劳动者，都一样干活，一样分钱，唯独头目的地位，可以世袭继承，别人不得越俎。但当头目的人，必须有一套对外交际的手腕和善于招揽、拉拢的能力，并可驾驶全体伙计们，听其指挥，处事公平合理，叫人实服才行。

“脚行班”，顾名思义，是以“脚”为行业，这个“脚”字，就是搬运的工具。“脚行班”这个行当，每个地方都有。或者名称不尽相同。

且说聊城的“脚行班”，在以前，他们是以行业类分，各分地段，不得相扰。例如东关驴市口一带地区的脚行班，专管给杂货行搬运货品。大街公盐店的装卸盐包，是由窦家营装

卸工人动手。乌枣装卸，是后菜市脚行班承担。其他如茶叶、药材等，都有他们专行专业的脚行班，绝不容许外人沾手。组织是相当严肃而认真，势力范围，界限分明。

聊城在过去，有三个粮食业麇集之处。即：东关闸口东的“粮食市街”，城内的“楼西大街”，东门外的“旧米市街”。这三个地方，都有八九家至十余家大小不等的粮行，称为“粮店”。每一处粮店经营区域，都有“脚行班”，专管给余户送货，挣“脚钱”。

东关粮食市街，是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粮店有“聚祥”、“协和”、“永盛”、“振昌”、“义聚东”等。这些家都是大字号，资金雄厚，交易频繁，脚行班也就适应形势而壮大。解放前，民国二十年前后，这里脚行班情况是这样：

（一）“两个系统三个班”。全体脚行

班，约三十多个工人，其中分两个系统，就是刘家营派和本街派。刘家营派首领是刘兴奎、刘太合。他两人所领的是第一班、第二班，这两个班二十人左右。本街派以郑、张两姓为首领，领第三班，约八、九个人。这三个班，虽然派系为二，而意志统一，且三班一体，通力合作，轮流按班依序分活。一个派系中的头目和班中伙计（工人），一样劳动，一样分钱，不享特权。如果头目死了，应由他的儿子继承其位，充当头目。如果继承人能力不够，或另有职业，那就由全班公推一位孚众望而胜任者充任。

（二）“充当伙计，工具自备”。如果想在脚行班里吃一份，当个伙计，要有自己的一套家伙，就是一辆小红车、几条布袋，加上自己的劳力，这是基本本钱。但要紧的是，你要有点机灵性，会做点“眼色活”（注1），例

如：“倒斛”时，忙着掇都子，倒布袋，挖巴斗。这些，虽然不是你分内应干的工作，也得主动动手。还有：把粮食送到买主家，如果遇到有“嫌好道歹”，褒贬粮食不好等情况发生，你还得有一套从中善于园团的话，把质量次的粮食，强化其优点，巧为解说，别叫买主打退了。因为这一类的买主，并不是三斗五斗的吃碴（注2）。乃是一要就是几十石的酒店、或油房、或囤户，这种户，是要好好侍候的。如果粮食打退了，不但店里受损失，你的脚钱也就落空了。至于平常住户人家，余几斗粮食，多是自己背走，没有叫脚行班送的。

（三）“新入班者，要“和班””。这个脚行班，别看是“下苦力”，但挣钱不少，在那时，能养家里四、五口人。而且天天有活干，有衣食嚼谷（注3）来源不愁之乐，无颠沛失业丢职之苦。因而，有的人，年青力壮，没有正

当职业，往往羡慕这一行，而想加入干一份，倒也不是太难，只要班上有活，需要添人，当头的并不十分刁难。只是，想加入的人，要“识趣”（注4）一点。先花两个钱，买买流水（注5）送点“好看”，（注6）给班中有力者，有班中人出面介绍和保证，就算加入了。上班后，当头的领着他，到这几家粮店走走，认识认识“掌柜的”，接着，这个新伙计就得打酒、叫菜，把全班的同伙们请一请，喝两盅，吃一嘴，这叫“和班”。

（四）“平均分钱，一视同仁”。一个班，别管几个伙计，几辆车子，也别管新的老的，都是同样看待，没有上级下属之分，也没有先尊后卑之别。这一天见的钱，都掺混到一起，到晚上一块分，凡是干活的，包括头目在内，都是干均一人一份。不过，才上来的新伙计，自己要聪明一点，多拣别人不愿干的活去

干，得到同班人谅解。

“脚钱，有一定数额规定”。脚行班送粮食，路程远近、粮食多少，脚钱（运费）有一定的规定数目。从东关粮食市，往城里送，每石粮食是六百文。如不足一石，五斗以上，也按一石算。如果不进城，只在东关，那就看路远近，有的四百文，近点的二百文。不等。他们这三个班，轮流出勤，分派较公平合理，无论城内东关三个班的每天收入，都归到一起，大家均分。班中有一个能写会算的先生（会计），这先生也是伙计，一样地跟着干活。天天推车子，送粮食，钱一点也不多分。

一天忙到晚，算盘子一响，每个伙计，都分到了应得的钱，整日的劳动，有了收获。小酒铺里喝上二两，各自回家去，养家糊口。虽说是脚手不闲地劳累一天，还是感到愉快的。

（五）“也有应行打差，及格外收入”。

所谓“应行打差”，是官府派下来的义务劳动，哪一行业也有。只要官府需要什么物品，属于哪行业，就派到该行业承办，这叫“应行”。打差是唯命是从地去义务尽职，这就是俗所谓“打官差”。官差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官府也时常买粮食。如往下发给养，发马料，或供应过路客军等等。向粮店买了粮食后，例须命脚行班送去，这种差事叫“送官粮”。送到后有时也管顿饭吃，有时也多少地赏给点钱。但不能按数讨要。应差的伙计，无论几辆车，几个人，也无论几天，全班每天见的钱（收入）都还有他们的一份。应差出勤，也是轮流。

粮食业中的脚行班，除送粮食挣脚力外，还有一宗传统性质的额外收入，就是“承送红板”。

“红板”，是做寿器（棺木）的原料，是把整棵柏树树身，用大锯锯成板，色泽内红，这叫“红板”。年年的阴历二月十九，东关陈家口，有四天骡马大会，大会上的木料市场，上市的红板，丛丛叠叠。红板成交后，须由粮业脚行班送买主，挣取脚钱。别业的脚行班，不得插手，如果买主自己有车来拉，那也要付少量的脚力给脚行班，这是规程。

、聊城的城关各个行业，都有专管卸运的脚行班，它们虽似附属于该行业，但系独立机构，是劳苦大众自己的组织，与该行业店号没有辖属关系。如属于粮食业的，只能光送粮食，绝不准包揽别的。他“应差”，也是限于“送官粮”。官家要搬运别的东西时，另支呼（注七）属于哪种行业的脚行班去干，绝不能乱派。

以上所述，是东关粮食市街的脚行班情

况。其他地方的粮业，如旧米市街，楼西大街（包括楼北）都有那一地段的脚行班，情况和这一样，有的活不怎么忙，人员少些而已。

（六）“班的公立制度和宗教信仰”。

脚行班，可以说它是旧时代中，家无恒产，又乏其他技能，只凭卖力气顾生活的，所谓低层社会的一种组织，属于“苦力帮”。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守着势力范围，而作营业上的保护。他们虽没有明文规定的“帮规”，却有大家口头议定的制度。他们是很讲义气的，每天收入的钱，他们也有合理安排。在没均分之前，从总数中提出百分之十，储存着不动，作为班内伙计们患病或因别的事而不能工作的生活费，以及扶助残疾者，帮助婚丧等。对外，要保持信用，对于雇主的粮食运送，要负安全责任，不能有所毁坏和丢失，否则必须赔偿。这些苦力劳动者虽穷，但个个遵守班中

制度。有时店里“倒仓”、“清囤”，也叫他们帮忙，似乎半义务性质，完工后由店里弄点菜，喝场酒。

再谈宗教信仰。从前，各个行业，都尊奉一位“祖师爷”，作为该行的原始创业人。其中也不少是牵强附会，硬把一个历史上有名人物捧出，做为祖师，这似乎是从想象而树立的神明偶像。如油漆业奉葛仙翁，卖肉的奉张飞，木工、建筑业奉鲁班等等。那么，脚班的祖师是谁呢？他们是崇拜那位推车子过赵州桥的“柴王”为祖师。每年的九月某日，据说是柴王的诞辰，城关的脚行工人，都借一处庙宇，临时挂上神像，一齐焚香叩拜。这一天，大家休工，在庙里摆上酒席，畅饮同乐，以资庆祝。

从前，脚行班这个组织，由于乡土意识的发扬，衣食根源的依持，有坚固的团结力和互助守信的道德观念。由于时代的进化，如今谈

来，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注：（1）眼色活，抢先去干目下应干的活，叫别人看你有机灵勤敏之优点。

（2）吃碴：是说他买去是吃，不是别用。

（3）嚼谷：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主要是粮食。

（4）识趣：不装呆卖傻，看风头行事。

（5）流水：暗指帐说，买流水即“买帐”之意，向对方趋奉，拉近乎。

（6）好看：做出事来显得光彩，这里作送点礼物讲。

（7）支呼：招呼、喊叫。分派。

东昌“万兴金店”

李培现

“捶金”行业，在以前商贾繁荣的通都大邑中，是不可缺少的手工业。捶金的产品，是金叶（金箔）金线。这种捶金技艺远在秦汉时代已普遍地盛行于权贵服饰，并流行于民间。北京定陵的明代万历皇帝朝服，即用金箔线织成。“金店”是以捶金技艺制造金片为业，要有雄厚的资本用以周转流动。并要有技艺专长的能工巧匠，一丝不苟的熟练操作。

聊城在明清漕运兴腾时期，工商业异常兴旺，民国初年仍存余辉。约在公元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三六年，聊城有一家“金店”是地方上的独一行业。它前后经营达数十年之久，所出产品质量优异，远销数省。笔者走访邑中几位

老人，将所得梗概，简述如下：

这家商号叫“泰兴金店”。原址在东关大街川廊东边路南，迄清代光绪初年，财东是钱秋亭。除金店外，还有楼南大街的“丰泰冒酱园”等数处生意。民国初年，钱氏又把金店转让给了宋鸿波，继续经营，后迁至城内楼东大街路北（约在今百货商店对过），字号改为“万兴金店”，宋鸿波在聊城也是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除其本人投资巨额外，又拉入了若干股东，实力相当雄厚。他聘用王贵泉为经理，此人理财有方，声气很大，多财善贾。

万兴金店是三间大门脸，挂有金字匾额和招牌，设有柜台、帐桌、几椅，内通局屋，客厅，为经理招待顾客、及会计收付银钱、记算帐目的地方，后面有宽敞的院子，浓密的槐荫，花木扶疏。再后是工人作坊、仓库、厨房、宿舍等约二三十间。雇用的师傅、徒工、

从事生产者十七、八人，最多达二十余人。这些专业劳动者，在产销旺季，昼夜加工，赶制金片，供应四面八方。

产品的销售：门面零售为数不多，主要销往外地。万兴金店设有“跑外”业务人员三、四人。携带样品，四处推销。如冀、鲁、豫、皖各省的有关县镇，都有长期顾主，进行交易。有的药商，可以收进金片，转向东北边境，换回朝鲜的鹿参、力参珍贵药材，每年的营业额，相当可观。

金店所生产的金片，型号虽是不一，但差异甚微。它的突出特点，是越薄越称为上品。其名有蝉翼、苇膜等，它薄的程度，人若不慎，呵气即可吹动。据其内行人见告：一张金片，重量不满一厘。厚度为一丝丝点五，似在0.1微米左右，有人夸张其薄说：“一两黄金可捶一亩二分地之大。”金片质量的优劣，是

以它的原料来决定。一般要求以黄金为上品，白金（金属化学原质之一，色白如银，可与铜、铝、金等溶合称为合金）次之，赤金（火金）更次。如用质量低下，含金量小的合金，是难以入选的。即是勉强捶成了金片，其色泽及使用效果，都大不相同，甚至可降为伪品，价值贬低亦不受欢迎。所以正当字号，绝不以劣质次品欺骗顾客，而损害自己的信誉。

金片生产及其制作规程：

一、熬液铸造。把零碎的金锭，放入坩埚中，用文武火逐渐加温冶炼，使其融化为液体，倾入模型内，凝结冷却后，即成“毛坯”。这种坩埚，是专能溶解玻璃及各种金属的用具，系山西省专窑陶土所制。模型为长条四棱见方，尺寸有一定标准。

二、规模锻打。从模型内取出金棒（条）用截金刀具，逐段截成相等数量的长度，（约

合十六两称的半两或一两）将原坯稍加捶击，用时再用天平过了数，移交下道工序。

三、疾徐捶打。毛坯进入第三道工序，就是要实施捶打的功夫了。捶金用三个人共同加工，将毛坯金条放于平整滑润的石头砧子上，由一人掌握，挪移方位，另外两人各执十多斤重的铁捶，猛力捶打。此时必须充分掌握好，既要使金条由厚而薄，又必表面稳平，中心和边缘匀称一致。初捶时片小片厚，继而逐渐扩大，变为薄片。用力高下疾徐，缓缓减弱。捶平时尤要点轻击，当金条由厚变薄，渐成金片至接近半成品时，金片上下就要衬垫一层“乌金纸”。这就是为了保证金片因体质太薄而免受直接损伤，金片经连续地捶击，越来越薄，接着动用剪刀，切剪相等的规格，再徐徐捶击，要凝神澄虑，小心翼翼，因为金片这时已到了功亏一篑的程度。因此，捶金的全部工

序，就是要把住完成成品这一关，因为成败之间只一霎那。如不具备捶金的过硬功夫，那能胜任？由原料到捶成金片再到成品，需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工人们不仅体力劳苦，思想也很集中，唯恐万一出错，交不上货，不但使柜上造成莫大损失，而自己也会受到解雇的威胁。

四、切剪。把已捶好的金片，轻轻地两手架起放在平板上交给专管切片的工人，按照规定尺寸用尺子压着缓缓切下。每张金片上都附上一张白纸，以便易于提取，防止裂痕、浮动。

五、包装。用专用纸把金片轻轻放平，折叠四折，恰将金片包严，不使外露。装箱时必须交叉放置，每十张夹一个小纸条，以便记数。装金片的小纸盒，约一立方寸左右，一盒即为一箱，容量一千张，盒的上下左右，都得

用净纸衬平、压紧，不能转动，防止有磨擦损伤。

金片的规格根据各地用户习惯要求，稍有不同，一般约等于现在的市寸见方，每克重量约为二十余张。因它体积纤小，薄脆、轻飘、娇弱。所以在操作使用过程方面，都有其一套极慎重而娴熟的方法。金片的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种：

（1）匾额、楹联、屏风，以及金属器具，建筑物装饰、古代兵器，仪仗等都用金片镶贴点缀。历经多年，金光灿烂，焕然一新，色泽耐久。如聊城东关几处会馆，多数匾额是以金片贴制。一二百年来仍然光莹四射，金彩夺目。据新编《南京史志》载：该地有家专业户，名“南京金线金箔厂”一九五五年创办，所产金片，曾用于北京的天安门、中南海、颐和园及扬州的平山堂、镇江金山寺、句容茅山

道院、南京栖霞寺、曲阜孔庙等高级建筑物，这种工艺品的财金，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赞赏。

（2）装塑佛像。佛像贴以金片、配合彩绘，越显得绚丽壮严。可显现祖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精湛艺术造诣。（今年曲阜圣像复原装饰四十八两黄金作捶片贴金之用）。

（3）古时妇女首饰，也大量使用金片用以点缀艺巧，增加美观。如“金钗”、“金钿”、“金步摇”等，唐宋诗词中有很多咏赞的句子。这次复制明代万历皇帝的朝服，即采用金线刺绣而成。

（4）装裱文物卷帙联对。唐代新进士及第，报喜的“金花贴子”即是用素绫为轴，贴上金花十分绚丽。

（5）用于医药配佐其他药物制成丸剂，可发挥一定的疗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载：

主治镇神、固肾、吐血、祛风、止痛等症。

东昌府的“万兴金店”自创业以来，生意兴隆。因产品质量稳定，从不以次货蒙混顾客，故而越叫越响，乃至远销南方数省。民国后，由于漕运停止，军阀混战，地方上商业逐渐凋敝，金店生意亦不断受到兵匪骚扰、敲诈，至一九三六年而宣告停业。现在从事此种传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捶金技术老工匠师傅虽多去世，但尚有子遗健在，应予迅速抢救。

武训中学

牛文华

抗日战争以前，堂邑县（1956年撤县，东部划归聊城，西部划归冠县，原堂邑县城今属聊城市堂邑镇）东北隅原文庙（孔庙）旧址，有一处私立初级中学。在堂邑东街小十字街朝北看，高高耸起的木结构“棂星”门外，有一道新筑的砖墙木门，门上方白地黑字，上书“山东省堂邑县私立武训初级中学”，是书法家于右任题的字。这所学校是1932年创办的，在这以前，鲁西北一带，仅有聊城省立第二中学，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和聊城省立师范学校，除此之外，周围十多个县，连一处中学也没有。堂邑私立武训中学的建立，解决了鲁西北部分青年学生的求学困难。

武训是原堂邑县柳林镇西北武庄人（今属冠县）。他一生行乞，积攒了钱财，先后在柳林镇、馆陶、临清建立了三处义学。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在堂邑一带广泛流传，不少堂邑县读书人深感有责任创办各级武训学校，使武训矢志兴学的精神得以发扬，以造福地方青年。

1932年春，赵丙淦、李瑞阶、张志和、范漩如等在济南联合堂邑县旅外青年，共商筹建武训学校事宜，决定先在堂邑县城创办初级中学一处，当即推选九人组成校董会，进行筹备工作，并推选赵丙淦为首届校长。为了争取社会上的支持，他们又聘请了山东大学教务长杜毅伯（聊城县人）为常务校董，并写信给著名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后来又将办校宗旨，招生计划以及学校大事等，按期寄给蔡元培先生，经他允准，邀请蔡元培先生为武训中学名誉总董。

1932年秋，堂邑县成立师范讲习所，校址设在城东北隅文庙内。征得县教育局的同意，私立武训中学就在同一地址建校，因陋就简，略事修缮，当即招收第一届新生两个班入学，赵丙淦任校长。1933年秋，因房舍困难，未招新生，并改由张志和任校长，至1934年秋去职，任职一年。1934年夏，县师范讲习所学生毕业后，武训中学续招第二届新生一个班。1934年秋后，复由赵丙淦任校长。1935年春，武训中学扩建六座教室，一座图书室，一座礼堂，并添置了一千多元的图书、教具、仪器等，至此，学校初具规模。1935年夏第一届学生毕业，秋天，又续招第三届新生两个班。1936年秋招第四届新生一个班，1937年夏，第二届学生毕业，这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未招新生。从1932年建校起，至1937年秋学校停办，先后历时五年，武训中学共招收学生四届六个

班，毕业两届三个班。

武训中学的领导机构由校董会聘请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校董会设常务董事，由杜毅伯、赵丙淦、李瑞阶任常务董事。

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一是学生交纳的学杂费，二是县教育局的补助及外界人士的捐献。学校房舍建筑、图书仪器的购置费用，全是赵丙淦一人捐助的，学校在堂邑东街路南设有“武训中学消费合作社”，供应笔墨纸张文具及日常生活用品等。聘请刘风海主持经营，李××为学徒。对武中师生均按八折售货，兼对外营业。稍有盈余，则归学校辅助经费开支。学校的教职员工少，赵丙淦、李瑞阶均义务供职。教师也多是校董会成员的同学或朋友，他们慕武训之名而来，宁愿接受比省立中学教师少三分之一的低工资，因此，学校能照常活动，并有所发展。

武训中学的学制及课程，均按当时教育部规定。教材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所出初级中学教科书。学校重视开展学生课外活动，启迪智慧，定期举办田径、球类、歌咏比赛，活跃学生生活。堂邑地处鲁西平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因此，学校非常重视选购图书报刊，以活跃师生的文化生活。学校专门修建了一座图书室，除订购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外，还购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供师生借阅，是当时堂邑县出现的第一个新型图书馆。学校还定期出版了校刊《武中学生》，由蔡元培题写刊名，每月出一本，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

按照当时的规定，私立中等学校须由校董会筹集资金，建立校舍后，先向教育厅备案，经省教育厅批准，才算取得合法手续。先是学

校建立之后，即报省教育厅备案，但省教育厅因学校基金不足，迟迟不予批准立案。第一届新生到1935年夏就要毕业了，学校立案手续尚未办妥，而学生的毕业证书不经教育厅验印，即不为社会公认，学生就不能升学就业。1934年10月，校董会公推陈秀章、李瑞阶去上海晋见总董蔡元培，蔡元培先生当即致函教育部，核准武训中学毕业生可参加升学考试，立案手续继续补办。

1937年秋，抗战初期，省立中等学校由省教育厅指令师生南迁，私立中学省教育厅却不过问。武训中学校董会无力组织学生南迁，于1937年秋照常开课。后来日寇进入山东境内，局势日益紧张，10月16日，学校被迫停课，师生离散。后来，日寇占据堂邑，以武训中学校舍作为司令部，学校的教具、图书遂损失殆尽。

先后曾在武训中学任职的主要人员

有：

赵丙淦（校长）北京中国大学毕业。
1932年秋至1933年秋，1934年秋至1937年
在职。

张志和（校长）济南师范二部文专科
毕业。1933年秋至1934年秋在职。

李瑞阶（训育主任兼文史教师）山东
大学肄业。

杜希凌（英语教师）中国大学英语系
毕业，抗战时牺牲。

马春鹏（国文教师）、陈香坡（数学
教师）。

庄式范（音乐教师）、高世范（体育
教师）、赵安邦（教务员）。

武训中学的学生来自鲁西北十几个县，包
括堂邑、聊城、临清、冠县、馆陶、莘县、朝
城、濮县、东阿、茌平、博平、高唐、夏津等

县广大农村，学生全部在校食宿。1937年10月武训中学停办后，师生四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多数学生参加了革命，有的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壮烈牺牲，如：

齐南峰，曾任朝城县长，1942年英勇牺牲。

吴亚坞，曾任茌平县长、专署行政科长，1941年在东阿壮烈牺牲。

许多人经过艰苦抗战，成为新中国的革命干部，分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肩负着领导职务，如：

刘哲（航空工业部某科研所负责人）

乔广正（河北省纪委书记）

李善亭（武汉军区后勤部纪委书记）

解长泰（海军航空兵副政委）

张矩（邯郸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李善增（聊城地区农办副主任）

文德小学

孙元芳整理

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以前，英国侵略者就已涉足聊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往往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大力兴办教会，用虚无的神圣欺骗愚弄中国人民是他们的软办法。英国的国教称阿里干，其在中国传教则命名曰：中华圣公会。二十年代，英国在山东设的中华圣公会总会建于泰安。总会牧师为英国人史多玛。泰安总会辖四个牧区，即东昌（聊城）牧区、兖州牧区、德州牧区和烟台牧区。

东昌牧区即东昌中华圣公会，其教堂建于聊城闸口南太平街西段。该教堂于1921年以后即开设教徒学习班。最初参加学习的为教堂职员、工人及教徒的子弟，后又吸收邻近居民的

子弟入学。大约于1925年，由教堂的会长兼牧师席永清主持召开校董会，商讨在此兴办小学事宜。出席这个校董会的有泰安中华圣公会教堂主教史多玛，东昌圣公会副会长杜子纯、传教士吴开祥和教堂附近居民代表丁钦浩。还有首任校长李育才，教员赵长江等七人。上述七人组成校董会。这次会议决定了如下事项：

（1）学校经费由泰安史多玛主教每年按需拨给。（2）学校业务由李育才主管。（3）学校修建事宜由吴开祥掌握。（4）未尽事项临时召开校董会商定。该校定名为：东昌圣公会私立文德小学。聊城唯一的教会办学自此开始。

这所小学隔路与教堂相对，为南院。占地十余亩。校院内有教室、宿舍（包括女生院）伙房、操场，设备较为齐全。该校长由教会任命，教员由教会聘请，一切权力归教会。这决

定了它与其他普通小学有截然的区别。文德小学的办学宗旨在于宣传圣公会所信仰的基督教旨，培养部分基督教宣传员。它的教学系统是小学——中学——大学——神学院，学生按此系统深造结果成为中华圣公会领导人——主教或牧师。最初，入校的学生，必须是加入了圣公会的基督教徒的子弟。学生可在校食宿，免收学费和书费。生活上，主食自备，学校补助煤炭和副食费用。所学内容以教会科目与普通小学课本并重。教会课目诸如《公祷经》、《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等颇齐全。入学学生早晚必须参加跪经、祈祷等仪式。唱《圣会诗章》之歌，做礼拜之举，以基督教信仰之节日度假，教会色彩异常浓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文德小学在县教育行政机构备案改名为：聊城县私立文德小学。教员的任免由县教育局做适当调整，并

招收非教徒子弟入学。逐步废除宗教课目。所习课程与普通小学大同小异。自此，该校的性质有了变化，开始以普通小学的面目出现于聊城教育界。文德小学与其他小学一起参加校际活动，接受省、县教育局的视导，显示了较好的成绩。如有一次参加县级小学运动会，竟夺得第一名，获得锦旗、奖品等。由于教会学校的缘故，该校学生毕业后大多考入泰安育英中学或德州博文中学，也有考入师范的。此外，经商、从医、务农等也皆有之。

该校在县教育局备案成为名符其实的小学之后，为四、二分段六年制完全小学，拥有一至六年级七个班的规模。毕业学生130人左右。该校师生受社会进步势力的影响，多有为挽救民族危亡奋起投入抗日行列者。如李振环（曾任中共聊城县委宣传部长，被敌杀害）、胡嘉和、林兆安、韩金寿、韩金鹏等。因受奴

化教育的毒害而走向歧途的民族败类也大有人在。如该校教师刘昌绪、学生张永太、陈世长、胡金爵等。

文德小学一九二五年正式成立，至一九四〇年因当时政府干涉，更由于英国教会资助金的断绝而停办。自建校至停办先后由安幼章、李育才、席广亭等人担任领导职务；杜永颢、杜仰奎、哈文灿、赵子安、张荫堂、高风歧、王思笃、郭风莲、刘王玺、刘昌绪以及翟成焕夫妇等先后任教。

文德小学在聊城教育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草拟此文，敬请知情者校正。

（此文由赵子安、张荫堂、杜思玉提供资料）

掇西书局

金志远

(一)

掇西书局原名世界书局，是沙镇孙丰老庄孙一德先生于1928年间创办的。孙一德前在武汉参加革命工作，宁汉分裂后回到聊城开办世界书局，经销小学教科书并附设石印工厂于书局后院，自任经理，邀请李师傅、蒋振江等人在石印厂负责印刷各种广告及学校所用簿册，生意颇为兴隆。该局开设于聊城县国民党部对门（现在新华市场副食大楼的西半部），有门面三间，局子一间。后院有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当年仿造大城市书店规格将门面装饰一新，均用玻璃门窗和新式柜台，展出书籍

和簿册，任人参观。顾客认为选购方便，因而招揽生意不少，每年盈利也很可观。

1930年秋，土匪王金发再占县城，住户、商店遭其抢掠一空，民不聊生，学校放假，该局因而倒闭。孙一德才将该局交由天和永笔庄和崇庆和油坊两号合资接办，仍以经销世界书局书籍为主，并兼营百货及文具等商品。

（二）

由于孙一德对内对外清理一切事务，新合伙人乃将店名改称掇西书局，以免与前世界书局混为一体。所取店名是沿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聊城所建掇西书院而来的。该店经理是金春庭，会计先后有柴茂林、赵国华等人。另有营业员丁述森、蒋风仪、蔡立亭等五人。为了对外联系业务，还聘请了聊城三师音乐教员何笑明和三师附小英文教员蒋庆发担任

交际员，以便向教育界推销商品。此外，还招收了学徒工高百万、金方昌等三人，负责店内杂务工作。

该局虽然用人不少，但对经营书业均系外行。如经理为油坊掌柜出身，会计柴茂林、营业员蔡立亭等均非书业中人，不过他们各有所长，同心合力为发展业务而吸取了各行的良好作风，使业务蒸蒸日上，年年流水增加，一个资本不多的后起书店每年盈利能达二千元以上。

(三)

摄西书局人员虽来自各行各业，但因吸取了各行经验，建立了较好的店规，为发展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如该店流动资金只有三千元，而所营商品很多，除经销世界书局课本外，还购销上海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会文堂

书局等处的新版书籍，并由广州采购了一些进步新书，兼营日用百货和文具音乐用品等，以致有时供不应求。为了方便顾客，发展营业，1932年该店还在博平城内开设了分店，由贾先生任经理，刘跃庭为会计，蔡立亭、高百万为营业员，每年盈利都在千元以上。

掇西书局在生活习惯方面还有些特点。如会计柴茂林是山西人，他按山西商人生活习惯管理生活，平时用细水长流的办法吃用从俭，将节约之款存储下来，作为每月初一、十五日和其他节日改善伙食之用，饭菜花样较多，同事们均表满意。该店只有柴茂林和高百万是外县人，其余均是聊城人。外地人规定每年回家探亲一次，本地人则每人每月在店住宿几天，回家住宿几天（俗称上宿下宿），以便店中夜班有人负责，因此从未发生过失窃事件。其次，店中有回民三人，其余均为汉民，故伙食

以汉民为主，回民则回家用饭。两族人民，互相尊重，感情融洽，这在民族团结方面还是不错的。

在店规方面，也有一套不成文的制度。如一切主要之事由经理作主，会计为辅，经理外出，会计当家。柜内只设座位三个，经理会计各占一席，余为店员轮流休息之处。店员、学徒（俗称站柜台的），不许坐而待客，货架书籍任由顾客取阅，店员招待顾客总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表现出生意人和气生财的作风，买卖双方从未发生过争执。至于经理、会计虽有“帅不离座”的老习惯。但遇有熟客到来，还是起而迎接，热情招待。这样对于解决大笔生意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该店会计仍用旧式帐簿，上收下支，设有日用流水帐、分类帐、万年帐（既资产帐）三种。另设记事牌一个，作为公布日常工作之

用。财务上严格执行日清、月结、年终总结制度，会计保密，遇有重要事件，由经理、会计在局子内会商，店员不得过问。

店员除供给伙食外，每月工资均在十元上下，年终结算后，则以平日工作情况为标准，分别酌予奖赏。学徒工只供伙食，不发工资，年终各得鞋袜费十二元。该店规定，每年正月初六日为店员、学徒进退日期。该日全体人员会餐后，由经理当众宣布留用辞退者名单，而自动辞职者，过年前必须向经理表示，以便觅人补充。

门面后院设有客房、仓库、伙房各一处，规定每天打扫洁净，尤其仓库内不许吸烟，全院都要小心火种，动物必须归原。学徒工对此负有专门责任，否则，经理要当面斥责。

该店除教科书外，新旧小说齐全，还购进了一些英文书籍，因之招来了一些中学、师范

的顾客，尤其是星期天生意更加兴隆。店员们夜间除加班外，还养成了看小说的习惯，对于他们增加知识是很有益处的。例如解放前后就有学徒工金方昌、印刷工人蒋振江、营业员蒋风仪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后来都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是该店的一份光荣。

(四)

摄西书局在聊城三大新书店中虽系小店（当年聊城中华书局和振东书局都是大书店），但在政治影响方面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是创办人孙一德，他到南方参加革命后，有人说他是农民讲习所毕业，但由武汉回聊城后，只营商业，不问政治。不知他如何与上海世界书局接上的关系，专卖中华书局和振东书局不经营的教科书，所以开业之后顾客盈门。又兼该店对门是聊城县国民党部，该党部负责人孙寒光是

一德的胞弟，外人总认为该店与党部有联系。其实孙一德确是无党派人士，与国民党并无关系。因为他并非商业里手，虽在初期捞了些利润，但为土匪抢劫一空，他就灰心丧气地改谋他业去了。

摄西书局经理金春庭早年与孙丰庄孙芳洲先生友好，因此与孙一德、孙寒光时有往来，而该庄的孙玉珠又曾在崇庆和当过学徒，后来与其兄玉堂、玉贵都参加了共产党。在孙丰庄成立中共支部后孙玉堂任交通站长，因之，春庭先生次子林翔在延安工作时，所有家书均由玉堂转送，玉堂进城工作都在摄西食宿，两家情况，互相了解。这是政治影响的一个方面。另外，春庭长子永昌，曾由广州邮过一些进步书刊，以供销售，该店得利不少。所以才能支持到1938年10月间日寇侵犯聊城前歇业。

1947年1月初聊城解放后，春庭先生即参

加了革命，曾任聊城县人民政府委员，兼城关镇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为群众服务数年，颇受好评。

总之，掇西书局由于经营得法，八年以来生意逐步发展，声名卓著。聊城为鲁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文教事业甚为发达。掇西书局经营的商品在聊城、博平、阳谷等十余县销路很广，对于发展鲁西文化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次该店歇业时，在一切债务清理完毕后，除将所有商品减价处理外，原有资金并未亏损，这是经营有方的结果。事经多载，回忆欠全，不当之处，望予指正。

振东书局

牛文华

聊城是鲁西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读书的风气很盛，文化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明清以来曾出现了傅以渐、邓钟岳两状元，清代著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杨以增所创建的“海源阁”即设在这里。由于南北交通便利、文化发达，这里的印书事业也相当驰名，著名的书店有“书业德”、“善成堂”等。他们印刷的书籍流通很广，西至山西、陕西，南到河南江苏，北达京津、河北。这些旧书店用木刻板印刷，所印书多限于“经”、“史”之类，以及通俗读物、童蒙读本等。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而衰败下来。

聊城自清末改书院、考院为学堂以后，采

取中西兼习的办法，仍以读经与学习数理等并存，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废除读经，改用教科书。聊城振东书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聊城第一座新式书店。它及时地运来最新出版的书刊，吸引了多少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子，从浩如烟海的书本里，吸取智慧和力量。振东书局对于发展学校教育，传播文化知识，促进文明进展，在聊城一带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

振东书局约建于1915年，至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前全部人员撤出止，二十多年来，它是聊城附近几县各级学校教学用书和知识界精神食粮的供应站。

振东书局是由聊城县的李簏庭和原堂邑县的牛琳庭联略亲友集资兴建的一处新式书店，股东共八家；

崔蕴璞（聊城楼东人） 李厚甫（堂邑道口铺人）

邢赓云（聊城楼东人） 萧兴让（堂邑萧香坊人）

焦荣轩（聊城××人） 李麓庭（聊城贾庄人）

郭××（冠县××人） 牛琳庭（堂邑牛庄人）

每股资金五百元，共集资四千元。

振东书局设在古楼东大街，东口以东路南（今市人民政府对过）。二十多年来，振东书局的人员变动不大，到抗日战争前共八人：

李麓庭任总经理，主管对外联系，后曾被选为聊城商会委员。

牛琳庭任经理，主管店内业务。

任德让（堂邑县梁水镇任庄人）为总帐先生，擅长书法。

魏华卿（聊城楼东人）为“外水”先生，主管赴外地催讨欠款。

董云亭（聊城楼南人）为营业员，主管柜台营业。

湛兰亭（堂邑梁水镇人）为帐房先生，主管收款记帐。

潘文江（堂邑牛庄人）为营业员。

韩春芳（聊城阎寺冯庄人）由学徒转为营业员。

另外，经常雇用厨师一人，主管做饭。

原来初建时只有六人（李、牛、任、魏、董、湛），后来周梦康（聊城龙湾人）来学徒，后转为营业员。二十年代末，由外地请来印刷师傅高××（瘸子），购置石印机器四部，在后院兼营印刷业务。这时又增添了潘树典（堂邑牛庄人，）为掌刀师傅，兼管石印帐目。李金英（聊城膏泽刘人）、牛延秋（堂邑

牛庄人)、潘文江为学徒。二年以后,李金英、牛延秋、潘文江都掌握了独立操作的石印技术,印刷师傅辞退了。不久,因专营印刷的多了,且连年战乱,印刷部就停业了。潘树典年老回家,李金英去冠县自办印刷局,周梦康与牛延秋自立文具店,都离开了振东书局。潘文江留在前柜为学徒,转为营业员后,又招收韩春芳为学徒,1936年转为营业员。

另外,在三十年代初,还聘请了在济南经营照像业务的吴星元兄弟二人,回聊城开起了照像馆,同时聘请了王筱岩师傅开设了镶牙馆,并请田××为帐房先生,周梦邹为学徒,开展了照像和镶牙业务。起初,生意倒也兴旺,不久,这种技艺在聊城就铺展开了。两三年后,聊城经营这种行业的多起来,吴氏兄弟和王筱岩师傅也先后离开了振东书局各自独立经营去了,振东书局的这两种营业也就结束

了。

振东书局的工作人员均在店内食宿、洗澡、理发等生活费用都由店内供给。生活水平比一般商店稍高，中午八菜一汤，晚饭四个菜，有客另从饭馆要菜。从经理到学徒，均享受同等待遇。经理、总帐、外水的工资每月五元，其余每月四元，学徒三元，年终都参加入股分红。

（二）

振东书局是专门经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的书店。创立之初，即与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签订合同，经销商务印书馆的图书，尤以中小学校所用的教科书、工具书为主，兼售上海会文堂、新亚图书出版公司等出版的说唱通俗小说。供应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朝城、阳谷、茌平、博平等县各级中小学校的教

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每学期为小学教师编有各科教师用书，名为“小学××科第×册教授法”）以及学生字典、字汇等。还为社会供应上海出版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绿牡丹》等。这类小说，多系用粉连纸石印，套装，字迹甚小，印刷粗糙。但也有字迹较大，印刷比较讲究的。有的首册印出人物图像，也有每回之前印一页图画，名曰“绣像×××”，在社会上流通甚广，销售量很大。蔡东藩编写的“历代通俗演义”，就属于这一类，对推广历史知识起了一定作用，很受欢迎。

三十年代初，京沪各中小书店，用白报纸铅印的旧小说，照定价一折八扣出售，风行一时。振东书局也曾经销过京沪立达书社、经纬书局印制的旧小说，后以错漏较多，乃停止经

售，改销上海亚东和广智书店等出版的旧小说。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新文化蓬勃发展，上海的新出版机构不断增多，新图书不断出现，逐渐涌进聊城。为了适应新形势，振东书局的两位经理曾先后两次亲赴上海，与商务印书馆总店，并先后与上海几家较大的出版机构，如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生活书店等签订合同，经售他们的出版物，直接由上海运来（或邮寄）聊城。那时商务印书馆林纾译述的小说，严复翻译的世界名著，还有文学研究会丛刊，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杂文集、小说集、郁达夫的小说集、冰心的诗集和《寄小读者》，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小说、童话集，光华书局出版的郭沫若的小说、诗歌集，还有亚东出版的《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从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顾颉刚的《古史辨》、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都是由振东书局最先经售，并受到社会欢迎的。

三十年代以后，各种定期发行的刊物增多，振东书局适应社会的需要，首先定购了一批刊物，供应读者，也代读者预订。销量较大的有商务印书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少年》、《儿童世界》，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月刊》，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文学》等，还有《太白》、《论语》、《宇宙风》、《译文》、《作家》、《中流》、《文学季刊》，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大型月刊《良友》画报，也颇受读者欢迎，该刊一直坚持到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抗战初期改为16开薄本周报，及时登载了各战场上的胜利捷报，直到1938

年这个画报陆续从邮局寄来聊城，由振东书局送到读者手中。该画报刊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照片，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上海抗战的实况，张治中、宋希濂等亲赴前线指挥的照片，这对当时由范筑先领导的鲁西北人民的抗战斗志，发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振东书局还为各县图书馆及各中等学校预购了大型丛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的《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库丛刊》、《国学基础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新文学大系》等。尤其是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工具书《辞源》（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版本，丁、戊两种为普及本。分上、下两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知识不断出现，原有条目需要修订，新增条目需要续编。1931年《辞源》修订本及续编（一册）开始预订，聊城一次就销售了几百部，连

同以前销售的旧版本，聊城地区中等以上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是人手一册了。

振东书局经售的图书，属于社会科学的较多，自然科学的较少，这是旧中国重文轻理的社会风气造成的。振东书局进货的依据是货物销售的情况，文化教育界的需要，以及书报目录的介绍。他们经销的图书以学校需要为主，兼顾社会需要，销售各级学校教学用书，中外文字典辞书、地图表册、中外小说、各类文选等。在他们的书架上，摆着《中山全书》、《三民主义》、《六法全书》等应时的书籍，既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有徐懋庸译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1934年国民党宣布查禁上海25家书店出版的149种图书，不少书在振东书局的书架上依然出售，在这里逃避了反动政府的法网。他们还从北平购来一批进步文艺书刊，如法捷耶夫的《毁

灭》等，不摆在书架上，却放到柜台底下，遇到熟识的青年读者，才拿出来征询意见。这类翻版书印刷较差，错字也不少，毛边，而且封面上多不印原名，也出售了不少。一些熟悉的朋友，在这里还会看到从法国寄来的《救国时报》，印刷很精致，上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图像，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这里，还出现过不少奇特的书，如《反三国》（于右任题写书名），还有上海金城书局出版的四十回本《老残游记》，分上下两册，句注、眉批、总评俱全，下册系伪作，因年代久远，何人批注，已记不清了。

商店以盈利为目的。为了扩大贸易范围，振东书局除了经营书籍、文具、球类等学校用品外，还建立了两个专柜。这种小柜台的好处是占地不用增加人，就可以增加收入，但经售的必须是名牌产品，才能吸引顾客。振东书局

的两个小专柜，一是湖笔徽墨，出售湖南长沙致中和的毛笔和安徽歙县的墨。湖笔徽墨是中外驰名的产品，很受顾客欢迎，销售量不小。另一专柜是名药，专售各地著名的成品药，如上海五洲大药房的清导丸、广州的六神丸，还有驰名药膏、万金油、仁丹等。这种专柜属于振东书局的兼营范围，自始自终保留着，为振东书局在聊城赢得了荣誉。

（三）

振东书局的房舍是股东崔蕴璞家的。三间瓦屋门面，东间向后延伸出一间局屋。门面的西侧有一座旧式大门，搬运货物均由大门出入，门内西侧接连两间小西屋，平时住人，存放破烂杂物，后来做过摄影部、镶牙馆的工作室。进入二门，后院有三进，第一进有南屋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南屋东间二层楼上存放杂

物，下面安设床铺，供来往客商住宿。外间是招待客人饮茶和吃饭的地方。南面上方正中悬挂着一方大木匾，上面是聊城邓钟岳状元写的四个大字。匾下边挂着一幅大鹅字中堂，两旁悬着对联。下面摆放着条几、八仙桌、太师椅。西间西墙上也悬挂着天津华士奎等名人的字画，摆着桌椅，南北各放木床一张，准备人多时住用。东西配房两座，里间住人，外面两间存放货物。院内架起葡萄秧，摆着柳叶桃、翠竹等盆景，是一个饮茶纳凉的好地方。南屋的西侧有厕所，东侧是小厨房和通往后院的便门。这便是振东书局占用的主要房舍。

第二进有东西屋各三间，西屋赁给山西布商住，东屋存放杂物，振东书局的石印馆就曾设在这里。

第三进，进入一座高台大门后，却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只在正南面有一座庙宇式的大

厦，屋内正中高台上端坐着观音菩萨，屋内堆放着一些杂物。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来，三十年代初，忽然来了一伙青少年，在这里打拳学艺，弄枪舞棒，给这空旷的小院落派了用场，为这寂静的地方带来了生气。原来是振东书局聘请王恒裕为教师，专教振东书局友好及同人子弟练习武术。参加学艺的有崔蕴璞、呼盍斋，还有魏树德兄弟、董廷祥等二三十人，每天清晨及下午放学以后，聚集在这里练武，坚持了二、三年之久。振东书局的学徒店员，每遇闲暇时，也常到这里踢踢腿、练练拳。

振东书局的门面一建立就很吸引人，它抛弃了传统式的板搭门，建造起玻璃门窗、玻璃柜台，里外透明，光彩夺目，为人传扬。三间门面的东西南面靠墙排着高高的书架，摆满了书。靠街的一面，中间是凹形玻璃门，门两边上层是三块并排着一米多高的大玻璃，下层为

木板。门内正中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柜，分上下两层，柜面是用厚玻璃板做的，两边是镶着玻璃的活动拉门，里边放着文具及文体用品，一眼望去，看得清清楚楚。玻璃柜后面有个一米多宽的过道，后面就是高达顶棚的货架了。货架正中挂着一架自鸣钟，钟正下方，放一张半园小桌，两旁各放一张椅子，供客人临时休息饮茶之用。玻璃柜两旁二尺过道以外，各有一个曲形柜台，二尺宽的木质柜面，下面也是一层玻璃柜壁，底座用木板支撑着，里面放着各种图表、文具等。正门两旁各放一排条椅，供人休息。西边横柜里放湖笔徽墨，东边横柜里放著名成药。东面曲形柜台里面放一桌一椅，是账先收款记帐的地方。西面曲形柜台里面也放着一桌两凳，购书人可以坐在那里选购喜爱的图书。南面书架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小门，东门通向局屋，西门通向后院。这里是

开架售书，木架上的书都竖排着，即书的背脊朝外，人们一看就知道什么书，可以任意拿来选购。大体上西面是文艺书籍，南面是辞书图表、数理、政法书籍，东面是医药以及线装成套的书，函套下面挂着一张写着书名的标签，便于人们选购。一般教科书是不上架的，因为学校开学有一定日期，售货时间多集中在开学前后的一段时间，就不占用货架了。

这种新式门面，吸引着行人。人们站在大街上，向里一望，一目了然，什么都看得到。门外还悬挂着两块长条招牌，上写经销上海商务印书馆各类图书，代售湖笔徽墨，各地名贵药品。大街上空高高悬着一块横招牌，从南到北，横空而过，上有山东著名书法家王诤书写的振东书局四个大字，后面有王诤署名及印章，非常醒目，招揽着过往行人。

那时聊城的街道很窄，每年元宵节，大街

上悬灯结彩，各种民间舞蹈、龙灯、狮子、高跷、秧歌等，都来县城会演，四外八乡的群众齐来观赏。有几年聊城安装了电灯，振东书局内外辉煌，行人到此总要停留一下，因而拥挤不堪。每年元宵节前，振东书局就要搭起木架栏杆，以防挤坏了门窗。

四

书店的顾客多是文化教育界人士，振东书局和文化教育界的交往也是频繁的。振东书局常在秋季开学之前请一次客，省立二中、三师的校长、主任、教师及县教育科长，凡是熟识的都在被邀之列。菜是向饭馆预订的，酒席自然很丰盛。满满地摆上两桌，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一面是为了建立友谊，一面也是一次很好的订货会，学校使用什么课本，当时就确定下来了。那时，除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出版的

图书，有另外两家书局经售外，商务印书馆以及其他书店出版的图书，多由振东书局承销了。销数最多的有：开明书店发行的林语堂编《开明英语读本》、北新书局发行的赵景深编的《混合国语读本》以及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傅东华编《复兴国文课本》。

三十年代前后，三师校长周拔夫，由于同乡关系，与振东书局素有来往。继周拔夫以后，孙芳时为三师校长，与振东书局关系更为密切。孙芳时在留学美国时，往返书信、汇款，多由振东书局经办，已是通家友好。二中校长郭锡九也较熟悉。至于各县教育界人士多与振书局有来往，外县校长、教师来聊城的，不少人就住在振东书局。由于教育界人士交往密切，也多做了不少生意，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万有文库》、《四库丛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均系振东书局经办，给各中

等学校和县教育局充实了图书室。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中、三师奉省教育厅令撤走了。当时聊城地区专员范筑先，坚持抗战，决不后撤。1938年春，山东省教育专员孙芳时和原诸城十三中学校长刘少青（聊城人），收容各县中等学校师生，在阳谷县安乐镇办起了联立中学。振东书局以抗战人人有责，决不后退，坚持在聊城营业，继续供应各机关学校书报文具等用品。这年春天，他们将现存教学用书整理出来，派店员潘文江、韩春芳运往安乐镇联中，在校内找了一间破房，又在屋外搭了个凉棚，临时出售图书文具，给学校解决了很大困难，在那里坚持了三个多月，直到那里一切就绪，才回聊城。

振东书局同人从经营的图书和接触的人士中，也接受了抗战教育。1938年11月15日上午在聊城沦陷之前，全部人员才从聊城撤出。聊

城沦陷后，全部财产都抛弃在城内。后来敌人放出风来，只要拿出几百元，振东书局的人员可以安全回城，发给全部财物，照常开张营业。但振东书局同人无动于衷，毫不理睬。在日寇占领期间，誓不进城。有的贫病交加，老死田园。在抗日战争期间，振东书局同人无一为敌效劳、甘当汉奸的。他们个个坚持民族正义，抱有爱国之志，这种精神是可嘉的。

振东书局很重视帮助青年。孙芳时留学美国，曾得到振东书局的帮助。解彭年留学日本、解占百在北京燕京大学学习，日常书信往来，邮寄学费，多由振东书局经手，他们来往也多住振东书局。其他象苏连景、傅懋勳等均与振东书局有一定关系。

画家呼盍斋，聊城县人，住振东书局错对过聚成山铜器铺后院，自幼喜爱绘画，后振东书局动员他去上海进修，并写信与上海联系，

1936年毕业于上海新华美术专科学校。呼盦斋在沪学习期间，书信往来，俱由振东书局办理。呼盦斋与振东书局关系密切，在沪学习期间，首次印出画集十幅，即有四幅是送振东书局同人的，并代请于右任（为上海新华美术专科学校董事长）为振东书局写来对联数幅。

郑子威、郑荐夫的父亲，原系聊城邮局局长，后在聊城病逝。郑氏兄弟年幼，李簏庭乃帮助他们母子安排好生活，送郑氏兄弟就学，并将其二女嫁郑氏兄弟。郑子威三师毕业，抗战初期南下，后在云南任某县银行行长，起义后继续任职。郑荐夫三师毕业，后在济南师范任课，解放后曾任济南幼儿师范副校长。

王恒裕，原为聊城理发师傅，按期到振东书局理发。后知其幼年习学武术，颇有成就，就请他在振东书局后院聚徒授艺。后孙芳时来聊任三师校长，就把他推荐到三师附小任拳技

教师，颇受欢迎，又转到三师任拳技教师。后来在刘少青的联立中学、阜阳山东师范学校继续任拳技教师。

其他如魏树德、宁筱纯等都曾受到过振东书局的接济，终至三师毕业，学有所成。至于振东书局的青年学徒李金英、牛延秋、潘文江等都没上过学，到振东书局后，有书读、有先生教，还供给笔墨纸张，给予时间，督促练习，终于都弄通了文字，牛延秋练得能写会画，解放后还教过小学，后转为地方干部。

振东书局还重视公益活动。三十年代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的热忱。1931年冬，聊城二中将要举办新年联欢晚会，振东书局便与二中联系，决定排演节目，参加义演。当时堂邑县教师宁纯吉在振东书局闲住，便请他执笔，编写抗日小调、双簧、拾万金及宣扬普及教育的《家信误》。

新年那天晚上，人山人海，舞台上演得非常出色。当演到在山西经营刷纸业工人父子，因不识字，请人代写家信时，将“因忙雇了一人”误写成“因亡故了一人”，弄得居家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台上演出的工人有切肤之痛，声泪俱下，台下也深受感动，抽泣不已。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人心沸腾，深恐在这日寇步步进逼的形势下，发生内战，国事堪忧，当时聊城群众都没有收音机，消息的来源主要靠报纸，而报纸来到聊城，已是隔了几天的新闻了。人们街谈巷议，焦急地等待新的消息。于是振东书局急致电济南兴盛长，代购收音机一架，迅即运来聊城。从此，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当天的新闻了。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每晚播放新闻时间，搬一个凳子，把收音机放在大街上，让左邻右舍、过往行人都能听到。每逢这时，大街两旁

挤满了人，远的近的都赶来听，路上连行人都堵住了。直到张学良将军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人们的焦急心情才平静下来。

五

1915年到1938年，二十多年中，振东书局有盛有衰。民国以来，军阀连年混战，张宗昌、孙殿英的军队，此出彼进，挠害百姓。1929年、1930年土匪王金发两次进占聊城，抢劫财物，生意停顿，振东书局受损失不小。后来省里派来了冯冠一部队来聊城剿匪，敲诈勒索，比土匪还厉害。有一次，冯冠一的一个副官来到振东书局买东西，挑选了网球拍、名贵药品等计价一百余元，临走时强要记账，柜上人员都不认识他，只好请总账先生任德让出来，和颜悦色地声称不认识，经理不在，伙计们不

敢作主。这位副官见事不遂心，于是将货放在柜上，说回去拿钱来取。隔了一天，那个副官带着两个护兵到柜上取货，并要柜上派人跟去司令部取钱。别人要去，他都不答应，专要总账任先生去。后来没办法，任先生只得跟他们去了，到了司令部就被扣押起来。柜上见事不妙，只好到处托人，直到第二天才把任先生领回来。后来专门请了司令部及说事人才算了事，货款自然是不了了之。在那个时代，这种明抢暗夺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振东书局虽然有盛有衰，但声誉不衰，有些经验教训是可作借鉴的。

一是团结友爱。振东书局用人得当，各负专责，同人之间团结友爱，从未发生过矛盾。大家互相尽力做好生意。就拿应酬门面来说，平时即使只有两三个人，一个会计、一个营业员，一个前后来往取拿东西的，也未发生过差

错。最忙要算开学前后的几天了，学校要添置图书设备，教师要购买参考书籍，学生要购买课本文具，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有时连饭也顾不得吃，只好等顾客走后再去吃饭。即使这样，从来没人说过累。但偶然的事也是有的，如：1931年商务印书馆预订《辞源》修订本及续编时，预定价比定价低，预定的数量很大，光聊城就预订了几百部。货到聊城时，忙着打包，订客来了要付书、包装，人来人往，忙了一个多月。这几百部大型工具书，送到知识界人士手里，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困难，发挥了一定作用。店员们虽然忙了一阵，却心安理得。他们坚持“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对待客人，端茶让坐，从未与顾客发生过争执，因此，不少人即使不买书，也常来书店坐坐聊天。

二是增产节约。振东书局对外从不吝啬，

而在内部则尽量节约。如客人买书，选好以后，都用纸包上捆好，这既是对顾客的礼貌，也是倡导爱护书籍的表现。这就需要大量的包装纸，他们从节约出发，却从未买过包装纸。每逢来货拆包时，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将原包装纸折叠好，留着继续用来包装。振东书局长期订阅上海《申报》一份，每天对开报纸三四张，源源寄来，他们看完新闻、经济广告等，便好好存起来，需要时，将旧报纸用来包装。另外，商务印书馆出有《出版周刊》，每周一期，八开20余页，按时寄给经销处。振东书局接到后，除分送各中学、县教科外，即将剩余的拆去书钉，当作包装纸，他们说，既省得再买包装纸，也作了义务宣传，让它随着顾客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仅这一项，就节省了不少开支。

三是信息灵通。振东书局的经理专门负责

收集信息，信息的来源也很广，如从销售情况上研究哪些是畅销书，从顾客、中小学教师、甚至小学生那里了解需求情况。他们与聊城附近的堂邑、冠县、馆陶、莘县、朝城、阳谷、寿张、博平、茌平等十几个县的书商、教科、学校保持联系，了解各地的需求。他们从图书目录及报纸广告上了解出版情况，还与济南、上海各大书店经常保持联系，从而保证了信息灵通。他们除与济南商务印书馆保持业务联系外，还与济南院西大街路南（今百货大楼西侧）兴盛长鞋帽庄保持着经常联系，差不多每日双方互寄一信。兴盛长贾韶九兄弟三人系聊城阎寺乡冯庄人，在济南经商，与振东书局关系密切，平时互通信息、代购货物，准确可靠。双方往来，俱住对方店铺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般。有一个时期聊城近视、老年远视的，急需眼镜，但在聊城买不到，兴盛长便从

济南代购一批眼镜，由振东书局销售。济南弓弦带脱销，成了热门货。振东书局便在聊城组织人员编织，并代为收购，运给济南兴盛长销售。由于内外联系，保证了信息灵通，生意兴隆。

此外，遵守信用、货真价实、老幼无欺，振东书局是坚守不移的。从而赢得了往来客商的好评。他们注意联系知识界人士，为生意开拓了门路，多方联系，进货路宽，方便了群众，也开展了业务。

个人见闻有限，挂一漏万，且事隔五十余年，全凭记忆，谬误难免，深望知情者给予指正，不胜感谢。

1985年6月25日

“海源阁”历劫考略

范景华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盗匪蜂起，海源阁多次遭受浩劫。

一八六一年（咸丰辛酉），捻军进占肥城，杨氏海源阁的藏书重地“陶南山馆”（在肥城西南的华跗庄）尽被兵燹，损毁十之三四。杨绍和跋宋本《毛诗》条载：“辛酉皖寇扰及，齐鲁之交，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处，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据余华跗庄陶南山馆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烬余，幸犹十存五六。而宋元旧槧，所焚独多，且经部尤甚。此本只存卷十八至末三卷，监本只卷首至十一而已。呜呼，岂真大美忌完，理同如是乎”。（注1）

“虽曰幸存五六，然海源阁上宋存书室之四经四史斋，竟致不易复厥旧观，亦可见其祸之烈。”（注2）王献唐先生说：“华跗庄附近田地，多为杨氏私产，所谓陶南山馆，即在其地。杨氏当时书籍，多藏于此，尚有砚石数百余方，亦存陶南。捻匪初时，焚掠极惨，适任柱追至，严令禁止，乃免于劫，宋元旧槧之仅存者，亦任柱之功也。”（注3）经此劫后，杨氏“访求典籍，依然不遗余力，秘籍精抄仍继续网罗。于劫后残册，或以新本配补，俾成完帙，或另取别刻，以复旧观”。（注4）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七月十日，土匪王金发复陷聊城，其司令部即设于杨氏宅内。当时前清生员秀才兰山樊天民和唐邑杨道南，颇知书本，为王金发出谋划策，将海源阁宋元秘籍及金石书画择优掠去。十一月，王献唐先生赴聊调查，目睹劫后状况：“余抵海源

阁时，见其书籍零落，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两册，均散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余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砚数十方，只存砚盒。所有砚石，均无一幸免。杨致堂画像一轴，撕裂如麻，投置几处。黄荛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为海源阁原本，第四册后页，亦以试抹鸦片烟签，涂污满纸。以镇库之珍籍损坏如此，可谓痛心。其家人并谓匪徒每以阁上书籍炊火，旧书不易燃烧，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此均以毛兴纸印之，并不蒸火也。”（注5）

“此次损失之书，均为海源阁旧藏，其后宅之室，均未波及。检视阁上现存书籍，尚有宋元善本，及荛翁精校之书。以《楹书隅录》衡之，均为下乘。”（注6）

早在一九二八年（土匪王金发陷聊之

前），海源阁的末世主人杨敬夫，便将主要精善珍本运赴天津，移藏其岳父劳之常宅（注7）。一九三一年，杨敬夫曾将大部分宋元珍本以八万银元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是年三月十二日，著名藏书家四川江安傅增湘（沅叔）亲临盐业银行库房观书。后来，这部分海源阁精华辗转归藏于北京图书馆。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春，聊城为巨匪王冠军所陷，海源阁书库又为匪军司令部。王匪据聊城，惨掠焚毁达八个月之久，聊城居民十室九空，海源阁藏书损毁尤甚。匪徒们“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子，拭烟枪，无不以书代之。”（注8）及匪溃退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注9）“楼下之帖片册页字画，损失大半。古砚二百余方，刻有名人题字叙述砚之流

传，共拓片四厚册，连同所拓之片，一概遗失……充宋、充元明版、清初版、殿本、手抄本，焚烧撕毁。古玩瓷器，残剩无几；装璜珍贵，玩器之紫檀架玻璃罩，形状万殊，堆集广庭，不下千余件，阁后之帖片贮藏室，帖片堆积数尺，因连雨一月，屋顶冲塌，帖片画成黑泥，无只字完整。”（注10）“斯诚今日吾国书林之浩劫也。”（注11）

匪首王冠军，“素稔杨氏藏书美富”，特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书籍古玩专家（号称九爷），尽检善本、碑帖、字画、古玩捆载八大箱而去。“九爷”其人，身长清癯、唇有黑须，居聊城月余，终不露姓名。王匪劫取宋元珍本八大箱，移至其籍河北保定，不久王挂彩自杀，书籍遂散失。当地奎文堂书肆，得之最多。其中有：《蔡中郎集》（黄莞圃顾涧蓂校跋，见《楹书隅录》），元本《事文类聚》（见江标

所刻《海源阁藏书目》)。同时又被文友堂购去数种。刘子《新论》一册(旧抄道藏本,黄蕘圃据残宋本校过,见《楹书隅录》),被傅增湘先生购得,付款一千元。

一九三〇年土匪摧残海源阁藏书,引起一场震惊中国文坛的轩然大波。天津《大公报》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发表了《海源阁藏书之最后呼吁》的社论;五月二十七日又发表了傅增湘《海源阁藏书记略》一文。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刘阶平的文章,题目是《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申报》等相继呼吁。

匪劫之后,杨敬夫派管事人邓华亭清点残余,计经部损失十分之七,史部损失十分之四,子部损失十分之四,集部损失十分之三,损失古墨二十箱,字帖片四十三箱,康熙、乾

隆、道光三朝瓷器四十箱。康熙、道光时酿制的绍兴酒二十四坛俱被群匪饮空，酒坛变为尿器。

当时北京、天津、济南、德州等地不断发现海源阁藏书。一九三〇年夏，琉璃厂书业崇文斋主人孙瑞卿由北京返归故里探亲，乘火车至德县打尖。恰逢该地集市，喧闹异常。“孙氏步行游逛，偶于旧货摊上发现摆有古书一堆，无意中竟检出一部稀世珍本宋刊《童蒙训》两册。孙喜出望外，即以廉值购入，致使宝贵珍本免遭于毁。孙氏兴高采烈地携书返回北京，得善价售归国立图书馆。”（注12）据《影印图藏善本丛刊提要》记载：《童蒙训》三卷，宋吕本中撰，历述师友道闻，多格言至论，宋时重之。卷末有题记四行，文曰：“绍定己丑郡守眉山李埴得此本子详刑使者，东莱吕公祖烈，因镌木于玉山堂以惠后学”由此可

知这是宋绍定重刻本，原为都玄敬藏书，后辗转归杨氏海源阁。“明时虽有复本，行式无异，然较之原刻，当不能同日而语。”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新闻报》载：

“匪军王冠军占聊城时抢出者，售于日人之十二种，闻价八万元。内有宋本《庄子》及世彩堂廖氏刻《柳集》《孟东野集》等。而《柳集》仅列价八千元，可谓廉价矣。最近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在博平剿匪，于匪窟内搜出海源阁书十数页，但已破烂不堪，良可惜也。”

王献唐先生曾亲赴北京，调查售书情况，录得售书总单，兹转摘如下：

北宋本《王摩诘集》六册（二千元）

宋本《楚辞》十二册（七千五百元）

北宋本《荀子》十册（四千二百元）

北宋本《陶诗》二册（三千五百元）

宋本《三谢诗》一册（二千元）

宋本《愧郾录》六册（三千三百元）

北本宋《淮南鸿烈》十二册（四千八百元）

宋本《庄子》十册（四千元）

宋本《管子》十册（四千元）

宋本《范文正公集》八册（二千三百元）

宋本《柳先生文集》二十四册（一万元）

宋本《韦苏州集》六册（二千三百元）

北宋本《新序》五册（六千元）

宋本《击壤集》六册（三千元）

北宋本《说苑》十册（五千五百元）

宋本《皇杜岑常四家诗集》四册（一千八百元）

《吕东莱集》（二千元）

宋本《蔡端明集》十六册（六千五百元）

宋本《山谷刀笔》十册（二千五百元）

宋本《晋书详节》十册（二千元）

宋本《孙可之集》二册（二千八百元）

宋本《会稽三赋》一册（一千三百元）

宋本《云庄四六余话》二册（二千元）

（上述售书单目又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十五两日，杨氏将劫余残损书籍装置五十余箱，用大车运往济南市纬一路东兴里杨宅。这部分明清版本，后来归藏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

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文革初期，海源阁故址荡毁无遗，至今已无遗址的任何标志，于是，驰名中外的海源阁在文明古国的土地上消逝了。

注（1）见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一。

（2）见陈登原《古今典籍散聚考》（上海书店1983年11月版）第237页。

（3）转引自《古今典籍散聚考》237页

（4）见《东方杂志》第28卷第10号第72页。

(5) 见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第12—14页山东省图书馆出版。

(6) 见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第12—14页山东省图书馆出版。

(7) 见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申报》和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新闻报》。

(8) 引自《东方杂志》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

(9) 见民国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时事新报》。

(10) 见民国二十年五月一日《申报》。

(11) 见《东方杂志》第28卷第10号第73页。

(12) 见198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5版雷梦水《海源阁珍本的散失》。

聊城八角鼓

锐 声

八角鼓，是介乎戏剧与曲艺之间的聊城民间说唱艺术。我国虽然有不少地方，如北京、济宁、以及东北各地也有八角鼓，但聊城八角鼓别树一帜，它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八角鼓的历史渊源

聊城八角鼓，原名八旗鼓。据初步考查，早在金、元时期，它就流传于东北满蒙八旗民间，而且是一种为上层人物所嗜好与称道的艺术形式，活动面很广。明代八角鼓因受异族之嫌一度衰落，但仍有不少汉人对它颇含兴味，因而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清代，八角鼓又重新兴旺，不仅在清兵和民间流传，而且活跃于官

廷王府，遇到吉庆盛典，凯旋班师，八角鼓更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娱乐形式。从有口碑记载，传到聊城，进而变成聊城八角鼓，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八角鼓造型别致，鼓为八角形，代表八旗，故又名小旗鼓。由檀、楠或铁梨木做成，单面蒙蟒皮，角与角之间的木框上，各透雕花图案，并串有一对小钹（称钹），弹、打、摇时，发出辅助性类似沙球的音响效果，增加强烈的节奏感。鼓的下面，嵌有园环，上系丝绦双穗，按八旗分色，或统为红色。穗，既代表五谷丰登，又意为长命百岁，赋双层含意。小钹象征娱乐之器，代表着天下太平，福禄安康。整个八角鼓，既是旗志又寓意深远。设计者可谓精心致力矣。

元时，随着版图的扩大，曾传入西域色目，但色目人的鼓没角没穗，鼓是园的，蒙羊皮，

弹搓相间的鼓法也基本相同，但技艺不佳，再加上地方风习、语言及民族生活条件的限制，更是缺乏八角鼓的特色。后来内地对唱八角鼓逊色的就贬之为“色鼓”，也叫“四等鼓”，意为没受过名人指教。

清时，八角鼓在北京非常流行，据北京一位老八角鼓爱好者雍剑尘介绍（注），当时不少有才学的风流文人，每逢良辰佳节便聚拢在一块弹唱八角鼓，八角鼓的曲牌很多，有八、九十个甚或一百有余，曲牌是死的，词是活的，可以随编随唱，即兴创作，一比文略才华，二取时事见解，大有借曲抒怀之趣。

八角鼓传到聊城，较为准确的年代是在清朝。康熙（从公元一六八九年到一七〇九年）曾四次来聊城，乾隆南巡也来过九次。护驾清兵中间很多人会唱八角鼓，是军中娱乐的重要艺术形式。聊城是运河沿岸重要码头，因此八

角鼓也就随着清帝南巡而在聊城落地生根。另有一说旧社会有些会唱八角鼓的浪迹艺人，顺运河南游留下的，总之，聊城八角鼓与上述两者都有着血缘关系，后来，由于方言的关系和艺人的长期探讨、实践，再加从地方民歌、曲艺、戏曲中间吸取营养，融化贯通，逐步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聊城八角鼓。

曲折成长的聊城八角鼓

一九三七年以前，聊城有两个八角鼓阵地，一个在北门里李家粉坊，为主的是张春庚，许玉江等，一个在礼拜寺街吴化侠家里，为主的是吴化侠，其他有贾占玉、阎兆德、赵金龙、刘庚寅（外号黑脸）以及拜吴化侠为师的逯本荣等，这两起八角鼓以吴化侠等的影响较大。吴化侠有文才而通音律，（有人说吴化侠是文秀才出身——待考），其他也多是些“文化人”

他们常常聚集一块又弹又唱，成了莫逆的艺友。他们不甘循规蹈矩，而是大胆革新，勇于冲破旧框框，对八角鼓的曲牌、唱腔、内容不断进行认真的推敲、整理、丰富、提高，更重要之举是化妆演出走向舞台，并创作了一些新节目，如《华容道》、《苏三起解》等大戏，开创了聊城八角鼓新纪元。不幸的是八角鼓这朵灿烂的民间艺术之花，随着旧社会人民遭到的兵燹匪患天灾人祸等劫难而受到致命的摧残。吴化侠、贾占玉等老艺人的相继去世，日寇侵占聊城，八角鼓便逐渐消声匿迹了。由于艺人们雄心犹存，在艰难的岁月中，终将八角鼓保留下来。

吴化侠死后，继之而起的是逯本荣。逯本荣十四、五岁时拜吴化侠为师学艺，因他的手指特别粗大，（外号逯大手指头），开始吴化侠不愿收他做徒弟，由于逯本荣刻苦好学、克

服了生理缺陷，却学得了一手好三弦，并且弹唱俱佳，尤其善演青衣花旦，后来成了吴化侠的得意高足。吴化侠死后，便自撑门户。聊城沦陷，李家粉坊张春庚一起八角鼓艺人东奔西散，有的逃亡乡下，逯本荣也离开城里回到老家刘营，聊城两个八角鼓阵地就此消失了。

逯本荣回到乡下，以本村为中心，培养了不少徒弟，如逯焕宾、逯焕英，后菜市的马占奎、黄辛胜，土城的王维清，豆营的麻世荣、麻长安、代少林等，这些人中以逯焕宾、逯焕英为年轻而“出类拔萃”，逯焕英弹三弦，逯焕宾唱，二人合作默契恰到好处，特别是逯焕宾的唱腔，朴实，圆润，吐字清楚，有弹性，更有浓厚的乡音与强烈的节奏感，实为他人所不及。但他二人弹的不会唱、唱不能弹，影响了八角鼓的流传，实属憾事。

李家粉坊一起的张春庚，日寇陷聊后回到

原籍墩台王，也教了些徒弟，形成了墩台王为中心的北方八角鼓。

南方逯本荣，北方张春庚，仍然是原来两个阵地的根基，他们各自延续着自己的艺术流派。但由于师承的关系，北方的仍较南方逊色。一缺乏创新，二节奏感弱，三色调不明快（吐词、发音、情调的综合），按曾庄八角鼓艺人展庆山同志的话说：“人家逯老先生唱的地道调拿得死。”所以解放后，逯本荣为北方所邀，几次到墩台王和曾庄传艺，连续达三年之久，使北方八角鼓的演唱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而后南北相互交流逐步地统一起来，

聊城八角鼓的风格与特点

聊城八角鼓，具有与其它姊妹戏种所共有的标准和要求，但它又有其它所不具备的特性，是取他人之长而避其短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

八角鼓的乐器很简单，只有一个八角鼓，一把三弦，一付截板，一只小钹。演员自弹自唱。八角鼓艺人有的弹三弦，但弹鼓是人人必须会的。队伍可多可少，演唱时间可短可长，既能便服清唱，又能化装演出，可一人一角，也可一人兼演多角，能演整出大戏，又可选场选段分“折”演出，能连本说书，又能择精缩句，更可贵之处，可以即兴创作，随编随唱，不受空间、时间、灯光、道具、服装、人员等条件的限制，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为典型的民间业余艺术形式。

八角鼓的曲牌很多，吴化侠、逯本荣在世时，能流传的有七、八十个，由于沧桑变幻，特别是旧政府不加提高扶植，有很大一部分曲牌失传了，到目前为止，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十个。

八角鼓的曲牌繁多，各有不同的艺术色调

节奏有快有慢，有急有缓。急如飞瀑直下，缓如潺潺溪流，加之淳朴的乡土语言，婉转动人的故事情节，艺人们唱起来有瘾，群众听起来有瘾，往往深夜不散，节目多演民风轶事，儿女情长的故事，听众又多是妇女，所以群众把它称之为“栓老婆橛子”。

八角鼓的题材丰富多彩，有正剧、悲剧，喜剧、闹剧。传统历史剧有《长板坡》、《西厢记》、《抱妆盒》、《华容道》、《女起解》、等，时事喜剧有《两亲家顶咀》、《小二姐要婆家》、《憨小要丈人》等，闹剧有《男秃子闹房》、《女秃子闹房》、《王安骂鸡》、《瞎子观灯》等，歌颂劳动人民的有《四时农家乐》、《庄稼乐》等，也有揭露旧社会官衙丑恶嘴脸的讽刺喜剧如《打面缸》等。其他还有一些反映风土民情、家庭琐事、儿女情长的小型节目。如《小二姐做梦》、《佳人算卦》等。所有这

些节目中，大都主题明确，爱憎分明，收到明显的社会教育效果。

八角鼓走上舞台之后，即有生旦净末行当之分，但不似京剧行当要求性格化之严格，仍不脱民间“玩艺儿”那种简便灵活的传统特点，只求其概念化而已。

八角鼓所以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成长中除继承原有曲牌艺术特色外，还吸收了一些当地民歌小调和各地艺术营养加以丰富。如曲牌中的“阴阳句”、“诗篇”、“坡儿下”、“莲花落”、“太平年”等是从河南鼓子词中吸收过来的；“石榴花”、“倒推船”等是从北京八角鼓“罗江怨”移植并发展变化而来的，有些是在原型基础上透过吸收、溶解，提炼出来的，如“黄莺调”、“广东歌”、“高阳歌”、“十把弦”等十余个曲牌，都是北京八角鼓所不见。艺人们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聊城八

角鼓更富有特色，成为祖国艺术百花园中的一颗明珠。

从曲牌名称上看，北京八角鼓和今天北京单弦（八角鼓的演变）在词名上都与各地民歌有相同之处，但聊城的八角鼓绝大部分都是自创词名，这是聊城艺人在成长道路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流派。

聊城八角鼓的新生

解放前处于奄奄一息的聊城八角鼓、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照耀下，获得了新生。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曾邀请聊城八角鼓录音，以著名八角鼓艺人逯本荣为首组成了四人八角鼓小组，到北京住了一个月，参加录音小组的有逯本荣、石兆文、亢怀明、王助山。王助山同志不是八

角鼓艺人，但很热爱八角鼓，曾对八角鼓部分节目的文字，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如由逯本荣口述的《四时农家乐》、《尼姑思凡》、《老来难》、《打面缸》等，都是王助山同志整理的。

一九五四年，聊城八角鼓第一次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由逯本荣演唱了传统节目《长坡坂》。

一九五八年，聊城八角鼓参加了地区文艺会演，演出了新编八角鼓《东风万里红旗飘》（锐声填词编曲）。

一九五九年参加了省文艺会演，演出了《我是公社饲养员》（锐声作词编曲），第一次以工农兵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聊城八角鼓经过连年的挖掘整理，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同时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舞

作用；在省地县举行的各级会演中，都作为地方代表性节目参加演出。如《财贸战线红旗飘》、《夸老伴》（锐声作词编曲）等均获得好评。其中《财贸战线红旗飘》（祖文、耀东作词，锐声、耀东编曲，董霞主演）于一九六〇年参加省职工文艺会演，获优秀节目奖，并被选入京参加全国职工文艺会演（改名《全心全意为顾客》），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文化部奖状。剧照分别发表在《山东画报》六〇年三月号的封面和《人民画报》六〇年三月号封底。并由马可、贺敬之、李焕之等撰文评论。

十年浩劫时期，八角鼓也难逃厄运，曾匿迹十多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废俱兴，聊城八角鼓才又在文艺百花园中枯枝发芽，昂首迎春。在一九八〇年地区曲艺会演中演出了《绣鞋案》（锐声改编、树栋编曲），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普查中

创作演出了《光荣的普查员》（锐声作词），同年地区曲艺会演创作演出了《邻居》，都获得优秀节目奖。

为了进一步拯救、挖掘、整理、发展艺术遗产，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曾分别到八角鼓基地的刘营、墩台王等地访问了一些老八角鼓艺人，并将他们所继承下来的曲牌、唱词录了音、记了谱，收集成册。到目前为止，保留下来的曲牌有三十六个、其他已经失传。文字上较完整的剧（节）目九个。除经王助山同志初步整理过的《打面缸》等四个剧目外，其他都是原来的内容，有待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使其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健康发展壮大，从而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

注1、雍剑尘为八角鼓艺人。于一九五一年的一天，在孟小如的家中谈及此事。孟小如京剧著名演员，曾任教于北京戏校。

运河演变与流经聊城考略

葛 渊

最近看到一篇地方史志资料，其中有“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修凿运河，经过聊城”的记载。考察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并非始于隋炀帝，隋开运河也不经过聊城。为了开展史料研讨，我们对运河的变迁作了粗略考证，并借此对聊城运河段的古今情况作简要记述。

聊城的运河是古代南北大运河的一段。运河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

京杭运河开始修建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要北上征伐齐国称霸中原，征调大批民伕从扬州附近的邗城开挖运河，南引长江水，向北经高邮县西，折向东北入宝应县东的射阳湖，又转向西北至淮安县流入淮河。当时称“邗沟”。公元前482年又继续北挖，连接泗、沂、济三水。结果征服齐国的愿望没有实现，即被越国所灭。但为贯通南北水上交通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战国初期，魏国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公元前361年开凿“鸿沟”，引黄河水循汴水至圃田泽（今中牟县西），又东北至大梁城北，折南循沙河入颍河，形成鸿沟水系，亦为南北运河的前身。

隋朝杨坚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政策，使江南地区的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每年有大批粮食北运。隋炀帝即

位后不久即建都于今河南洛阳。为了搜括南方的粮食物资和调动军队的需要，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下令开凿运河。当时以洛阳为中心。从洛阳城西引谷水、洛水经洛阳往东入黄河。再引黄河水东至荥阳北，经郑州向东循鸿沟、汴水折向东南，经商丘、安徽宿县，在江苏泗洪以南进入洪泽湖。又从洪泽湖东北开挖渠道至清江与邗沟相通。全长1000多公里，当时称为“通济渠”。

接着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调发军民百万余，从洛阳向北经河南武陟、汲县到山东临清北上天津，直达北京城西南（古称涿郡），开挖了一段长约1000多公里的运河，当时称“永济渠”。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又从江苏镇江经丹阳、无锡、绕太湖东直达浙江杭州，开挖了一条长约400多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又

修复了原来的“邗沟”。至此，北从北京，西绕洛阳，南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部凿成，全程2700多公里。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与江南的水路联系要西绕洛阳很不方便。为了缩短航线，元初漕运改变方向，从扬州附近沿战国时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故道，北上进入淮河，又向北接通黄河，运粮船在黄河中逆水西行，到河南封丘县的中滦镇登陆。北行180里，到浚县西南的淇门又换水运，复由卫运河驶抵通州，还要陆行50里才到北京。这样辗转华北，水陆交替，困难也多。当时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来山东勘察，设计运河路线东移，从鲁西穿过。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命兵部尚书奥鲁赤等，从山东济宁到安山开挖济州河长150里，沟通济、泗两水。至元二十六年

（公元1289年），自安山西南开挖会通河；南与济州河相接，北过东昌（聊城）至临清入卫河，长250余里。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又开挖了北京至通县的通惠河，这样从北京直达杭州，比西绕洛阳缩短了900多公里。这就是近代的京杭大运河，对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元至元二十六年开挖会通河后，通航九十多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漫过东平湖，造成运河大部淤塞，停航20多年。明永乐九年（公元1412年），工部尚书宋礼征集民伕16万人，疏浚南自济宁北至临清385里的元人故道，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一，于东平戴村筑坝，拦截汶水，向南导入汶上南旺湖，并在龙王庙实行南北分流，注入运河；二，又在汶上袁口重开新河，北至寿张沙湾接入旧河；三，在运

河东岸把济水、泗水、沂河等多处水源汇集成十多个湖泊，补充运河水源；四，为了调节流量水位和方便交通，东平至临清建船闸16座，进水闸9座，泄水闸6座，涵洞14个，桥梁10座（其中木制活动桥6座），使载重800石的运粮船畅行无阻，每年从江南北运粮食达400万石以上。

此后四百多年，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东昌（聊城）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漕运促进商业发展，清乾隆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东昌府声位愈增，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之都会”。当时江南与秦晋商人，以通济闸（今东关闸口）为中心，在沿河两岸建有“山陕”、“苏州”、“江苏”、“武林（杭州）”等会馆。其辉煌壮丽以“山陕会馆”为最。这座会馆的建筑群至今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其精湛艺术可与北京“颐和园”相比

美。《文物》杂志1959年第12期撰文评价说：

“具有独特风格的古建筑群，堪称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之瑰宝。”山陕会馆的图景是山东气象预报的聊城标志之一。明、清从运河涌进聊城的物资有南方的茶、米、糖、绸，和北方的乌枣、贡面、槐米等农副特产，码头上堆积如山。运河两岸的繁荣街道被誉为：“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东昌府为清皇帝巡游之地，康熙从公元1689年到1709年前后来聊城四次。乾隆从公元1748年到1790年共来聊城九次。当时的画师把大运河，光岳楼，铁塔等绘制大幅写生画，刊入《南巡盛典》一书。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聊城杨以增任运河漕运总督，收藏古代南北图书二十万零八千三百卷，在聊城建有“海源阁”藏书楼，被誉为清代晚期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决口于河南兰考铜瓦厢，运河堤被冲毁，黄河改道北徙穿运，造成河道梗塞，此时又因海运兴起，漕运或改海运或折现金，经运河北上的船只仅剩一小部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裁减管河人员，运河遂废。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重新疏浚黄河以北运河，据1936年《山东水利专刊》编写的疏浚北运河概况载：“北运河流域原为消纳运西坡水，及恢复黄河至临清间的航运，故工程计划即依此旨，前定聊城以南底降五万分之一，以北十万分之一，河底宽十二公尺，坡降1：2，河底高差为1.8公尺，统计土方为一千四百万公方。此次征夫治运，悉循以往挑河办法，按地亩调集民夫，计分全河为临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阳谷、东阿七段……不数日间全河竟到民夫二十余万人，至七月十

五日全河土方大体完成。考沿河人民之所以如斯踊跃者，因运河可以吸收各坡洼之水，不致淹没良田，然实际心理欲一睹运河之舟楫连樯，交通便利也。”疏浚后虽一度通航，但未能持久。1938年11月15日，日寇侵占聊城，长期无人治理，黄河以北至临清的运河遂成废河。

建国后，1951年重新治理张秋至临清河段，在陶城铺和牛屯设虹吸管，并在张秋设金堤河泄水闸，引金堤河水补充运河水源。并维修了周店船闸和李海务、龙湾、闸口，辛闸、梁乡闸，土闸等沿河桥梁。聊城县境内河口宽24米左右，保持水深1—2米，汛期3米左右，全县有木船106艘，担任河上运输。1959年以前运河担负着聊城的煤炭供应和南北物资交流的任务。

1954年利用运河发展农田灌溉，聊城境内运河两岸先后建立墩台王、张湾、辛闸南、坡

舒、念箔、周店、邓楼、梁水镇等8处小型自流灌区，灌溉面积16万余亩。

1958年冬季，在李海务运河左岸建立小型水利发电站一处，过水流量4—5秒立米，落差1—1.5米，发电40—50千瓦。运河水通过发电站泄入赵王河，当时因曹潭洼排水受阻，发电月余后停。

1959年开挖位临运河，自黄河北岸牛屯向北，至阿城南入原运河，在聊城市周店改道西行，经王堤口穿徒骇河，过王铺穿马颊河，至临清兴闸口入卫运河。这段运河代替了运河故道，全长110公里，担负着两岸农田灌溉的任务。

1981年国务院决定黄河向天津送水，位临运河列为引黄济津工程。当年秋后聊城地区组织15万民工扩大治理，周店河底宽30米，边坡1：3，河深2.8米，堤高1.8米，水深3.5

米，过水流量由原来的80秒立米，加大为96秒立米，于1982年1月正式向天津送水。

1982—1983年先后修建位临运河王堤口、王铺两座渡槽，与徒骇河、马颊河拦河闸构成了现代化的水利枢纽工程，为今后南水北调打下了基础。

注：本篇资料来自清代靳甫著《治河方略》，清代《东昌府志》，民国二十五年山东省建设厅出版的《山东水利专刊》建国后水利部编写的《中国河流》和聊城县水利资料等。

聊城县故城考

梁金中

微子城

聊城在商朝末期，为微子国，是殷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受封之地。微子是商王帝乙之庶长子，名启。纣封启于微，为子爵，故称微子。

纣荒淫无道，微谏之不听，及周克殷，微抱祭器归周，而后周武王改封于宋。商邱为宋国都城。见《论语、微子》与《县志》。

考庶、支庶也。旧称非正妻所生之子为庶子，微与纣排列为兄，故称庶兄。

《聊城县乡土志》载：周武王封微子于宋。按东平、曹州皆宋地，而微子则在聊城为是。《寰宇记》记载：聊城微子城，纣之庶兄封邑于此，故有城存。清·嘉庆十三年《东

昌府志》曰：《城冢记》云，微子城在聊城东北十八里。

《续山东考古录》上说：据聊城县志图，微城所在，正古掇城，掇城临黄沟，黄沟亦称湄河。考“微”、“湄”二字古通用，湄河即微河。

可见，微子城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古掇城，即掇国故城。故城遗址待考。

郭 城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时，聊城为周郭国，周文王季弟受封于此，后入齐。周惠王七年（公元前670年）郭亡。齐桓公至郭问：“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也。”

《寰宇记》记载：聊城之郭城，《隋图经》云：即亡国郭氏之墟。《方輿纪要》与《府志·墟郭》均载曰：郭城在府东北。《水经注》

记载：黄沟经掇城北，城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东南隅有金城（大城中之小城曰金城），墟郭尚存，左右多坟垆。又云：聊城有郭水，水泛则津注，水耗则辍流。盖水因地为名也。见《府志》。

《续山东考古录》记载：掇邑故城在博平西南三十里许，又名郭城。杜预《春秋释地》曰：聊城县东北有掇城。又云：《魏志》记载：聊城有畔城，而无掇城、郭城、微子城，实一城耳。

考微子城即是掇城，掇城又名郭城，因此可知，畔城、掇城、郭城、微子城名称不同，是因时而异其名，实际是一个城池。

确礮城（古济州）

《水经注》：确礮，津名也，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魏立济州治此也。（魏文帝曹丕

设济州牧治此）

《元和郡县志》：确礲城又名敲礲，为古济州所在地。本秦东郡在平县地，在古黄河南岸，其城西临黄河，即在大河之曲。东晋、南北朝时为军事要地。东晋太元中谢玄，义熙中刘裕以及刘宋元嘉年间的北伐，皆曾遣兵据此。晋末为河水所毁，移理黄河北岸博州（聊城）界。

《魏书》记载：北魏济州部治济北敲礲城领郡五：济北郡（治敲礲），平原郡（治王城），南清河郡（治灵县），东平郡（治须城），东济北郡（治平阴）。

《聊城县乡土志》记载：济北即聊城，汉高帝元年，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

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又置济州治此，为河南四镇（敲礲、滑台、洛阳、虎牢）之一，建有浮桥。辖境相当今高唐、聊城、肥

城、东阿、阳谷、范县等县地。北周亦置济州于此。隋开皇初废。自晋末济州移理河北聊城县境后，因城西南河水顶冲，屡筑屡毁，至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州城又为河水所陷，遂废。唐天佑三年（公元906年）又将武水、聊城、博平、高唐河外之地，划归郛州（东平）。

由上述资料证明，古济北敲器城，晋末以前为茌平县地，晋末以后为聊城县地，两岸有浮桥相连，其址，在茌平西南，聊城东南，二县交界处。约今赵泮庄、张洪津左右，确切地址待考。

聊古庙

《左傳》載：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晏子对齐侯曰：聊、掇（注：聊掇二小国名。）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

聊、摄齐西界也。这是聊城出现在史册上的最早记载，聊古庙是最早的古聊城所在地，也是秦、汉、魏、晋时的聊城故城。

聊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名、筑城屯兵为齐燕两国争战之地。据《聊城县乡土志兵事录》记载：战国时燕国军事家乐毅，带兵攻聊城不下，闻弦诵声后，以书喻之乃下。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齐将田单率兵伐燕复国，燕将乐英（乐毅之弟）守聊城，齐将田单攻城年余未下。齐国高士鲁仲连（《壮丽的山河》云：古代聊摄地，后为东昌治，战国属齐，辩士鲁连的故乡。一说：鲁仲连又称鲁连，在平东北望鲁店人。）遗书城中，燕将乐英见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降见辱。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乃复归齐。

《方輿紀要》載：城東側有魯連台，高七丈。《水經注》：漯水又北經聊城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台，秀出雲表。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眾者也。

聊城春秋戰國時屬齊國。秦朝置縣屬東郡（濮陽為郡治所），兩漢因之。《續山東考古錄》載：三國時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聊城為縣王國，正始五年（公元245年）復故。晉時聊城屬平原國。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聊城治所由聊古廟遷往王城。聊古廟位於今聊城西北十五里，西新河西岸，推算治所在聊古廟的時間為一千零二十一年，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

聊古廟西北約五十米是顓頊墓，顓頊為古帝之一，是黃帝孫，年十歲輔佐少昊，二十歲即帝位，初國于高陽，因號高陽氏，後都于帝

邱（今濮阳），所以颛顼墓又叫高阳氏陵。按《一统志》记载：帝颛顼高阳氏陵有二：一在开州（今河南濮阳）；一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即今城西北聊古庙。陵前有圣水井，古时每逢旱灾，群众就到此取水祈雨，立有感应碑。该陵，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重修有碑。明代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巡按御史鍾化民建庙，本县人傅光宅记之。清·康熙时，状元邓鍾岳为庙写“匾额”，起名叫聊古庙。颛顼墓传说是他的衣冠冢，或泥塑像的埋葬处，无可考证。日寇入侵后，聊古庙建日伪乡公所。1945年解放当地，群众基于对敌人愤恨，拆除据点，扒掉庙宇，至此聊古庙成为废墟。

1969年七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颛顼墓挖出黑色陶片，经鉴定为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支系。故认定附近是原始社会晚期

氏族部落。可见聊城历史悠久，古为炎皇子孙生息之地，是我国开发较早地区之一。

墟郭方圆五百平方米。1978年，党和政府为保护古迹，在此立有方碑，铭文：“聊古庙遗址”。

王 城

南北朝时期，北朝是北魏。而后分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聊城为北魏之地。王城是北魏时期的平原郡城，也是隋、唐时期的古博州城，又是当时的聊城县城。

《水经注》：黄沟又东北经掇城北，又东经文乡城北，又东南经王城北。北魏明元帝太常七年（公元422年），安平王镇守平原所筑，谓之王城。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废镇立平原郡治此也。《续山东考古录》记载：太和二十三年移平原郡于此，并

移聊城县治此。至北魏孝昌时，又分置西聊县（今聊古庙），至北齐时，又废西聊入聊城。当时平原郡领：聊城、博平、茌平、西聊四个县。

清嘉庆《东昌府志》载：隋开皇三年（公元582年）废郡，十六年（公元595年）又于王城置博州，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废。隋乱，隋将宇文化及杀杨广，自江都举兵至此，隋臣郑善果从化及据聊城。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又攻陷其城，杀化及获善果遂据其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重置博州。见《元和志》。博州领：聊城、博平、武水、清平、高唐、堂邑六县。

五代时期，聊城属后晋。石敬瑭灭后唐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也称石晋（公元936年——946年）。石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黄河决口，王城淹没，郡、县治南迁巢陵，县

治所在王城的时间为四百四十六年。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东昌府志》关于王城故城遗址记载如下：

故博州在今府东北二十五里，晋开运二年河决城圯。见《永乐志》。

故博州在今府东北二十五里，隋置博州，石晋开运初，河涨城堙。见《万历旧志》。

按：《旧志》在东北二十五里者非。又按：《旧志》以王城与古聊城混合为一，大谬。《旧志》又别出隋博州城，考隋之博州即故王城，也不应复出。

以上是嘉庆《东昌府志》对《万历旧志》关于王城故城遗址方向错误记载纠正全文。

考《永乐志》是明朝初期，朱棣当皇帝，当年七月召集天下文人三千人编写《永乐大典》，历时五年十一月全书告成，共两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他亲自为此书写序，这部书是

研究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距今已有五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万历旧志》是明朝末期编著的地方志书，对王城故址，以讹传讹。嘉庆《东昌府志》是清中期编著，对王城故址方向，又作了正确纠正。

考嘉庆二年东昌知府毕亨，在射书台记中也说：“予考聊城故城，在今府治西北十五里，战国时古聊邑汉聊城也，其后迁于旧州坡，为隋唐博州治，再迁于巢陵，三迁而后及于今城。”也说明王城在府东旧州坡。

再考宣统二年《聊城县志》记载：《永乐志》羊使君祠在府东湄河东五里。羊使君是石晋博州郡守，开运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没，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垫溺，愿以身代，乃投水而死。水止民思其仁，立祠以祀。”如果王城不在城东，绝不会把羊使君祠，建在城东湄河东五里之处，因此确认王城在今城东无疑。

王城确切地址，在城东旧州洼（即旧州坡）许田庄南。建国初期尚有高3.5米的土堆遗址，当地群众叫“老台”，现已平为良田。《旧志》曾把王城遗址误认为是巢陵故城，谬甚。

巢陵故城

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记载：石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河决城毁（王城），南徙巢陵，于此立州。今治东南十五里，址犹存。见《永乐志》。

巢陵城在府东南十五里，巢父隐居之处，五代晋开运初置。见清宣统二年《聊城县志》。巢陵以巢父墓而名，墓在城中十字街东南。

《汉书·鲍宣传》：尧舜在上，下有巢、由，是上古时两大高士巢父与许由也。相传，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不受，乃逃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居，农耕而食。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洗耳于颍水之滨。时巢父牵牛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为九州长，恶闻其声，因而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山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牛口，于是牵牛上流饮之。尧以天下让巢父，巢山居不营世利，亦不受，树上筑巢而隐居，因此号称巢父。

《东昌府志》地图上，标有“巢父遗牧”故址，为巢父隐居躬耕之处。明、清把“巢父遗牧”列为聊城的八景之一。

巢陵遗址，在今城东南十五里，大石槽村西头，即现在新建的几排红瓦房处，当地群众叫巢父陵。其西南原有一南北土陵叫祭岁坪，再西南原有一大土丘叫尧王坟，南原有一大坑叫卧牛坑，东北百米处，原有一处寺院叫洪佛

寺。宋朝博州治所在巢陵，至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六月，河决巢陵城毁，州、县治所移至今治。推算州、县治在巢陵的时间，为四十七年。

196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考察时，出土文物有汉代的麻点砖块，东汉的绳纹筒瓦片等。

凤凰城

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六月，黄河决口，巢陵城毁，州、县治所迁至崇武渡（又名孝武渡）西，即今治也。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建城，旧筑以土。

金代，聊城为山东西路博州治所，县为州领，博州即聊城。

元代，聊城为山东宣慰司东昌路总管府治所，县为府领。（注：东昌之名，系汉朝孝宣

时，封清河刚王子成为东昌侯，而东昌之名，始见其地）。

明代，洪武元年，改东昌路为东昌府，聊城为其治所，县为府领。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东昌卫守御指挥签事陈镛主持，将宋筑土城改为砖城。城周七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地阔三丈，深二丈。城墙内层纯是三合土，外层用特制的大砖和石头砌垒而成。四门是两道城门，东、西、南都有扭头门，北门为重叠门似凤尾，东西二门的扭头门，门向南似凤翅，南门扭头门，门向东似凤头，故名凤凰城。

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李廷桐撰《重修东昌记略》一文中，对城池的记载：

“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濶杀尺三十有五，为门凡四。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宣武’。城上登望之楼，凡二

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楼焉。楼卒之舍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吊桥、涵洞、垠门、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而新之。”

此文介绍城周七里多，但民间传说四周九里十三步，大概连环城的十二个炮台（又名射箭台）长度也数在内了。又说城墙高度三丈五尺，底宽三丈五尺，城楼比较有名的是东北角的“望岳”，西北角上的“绿云”二楼。四门除城门外，还有垠门（即二道门），东西南三面系扭头门，北门为重叠门。水门是城门外面护圈上开设的小门，平时关闭。东西南三面水门与城门相对，外面设有吊桥。北面水门向东开，吊桥对着垠门。城高池深布列严密，易守难攻，故当时有能陷不失的凤凰城之说。

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莫与齐在墙上又重修瞭望楼二十七座，城墙垛口两千七

百有奇，四门名称变更为：东曰“寅宾”，西曰“纳日”。南曰“南熏”。北曰“锁钥”。四门都修有瞭望楼，系仿摹京都门楼建筑，飞檐重楼，巍峨壮观。明朝御史邑人傅光宅有：

“偕客登楼远眺”诗，想是当时有楼梯可以登临，民国期间已无楼梯。头道北门里有一座高大影壁迎门矗立，城东南角有一座塔式的“魁星楼”，西北角建有“关帝庙”，越发把这座古城，衬托得庄严雄伟。

凤凰城，水深池固，便于坚守，历史上为设防重点和扼守要地。明朝初期设平山、东昌两卫，共一万一千二百人，分布四乡屯兵垦田。清初仍置两卫，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将平山卫撤销，并入东昌卫。民国期间，军阀混战，1928年聊城驻三个军共三万余人，五月北伐军占济南，军阀部队，闻风而逃。聊城空防数月，因此在1928年—1929年

内，土匪王金法曾三次占据聊城，给人民造成严重祸害。日本投降后，顽军王金祥、赵振华、郭培德残部二千人窜入城内，据城拒绝解放。1946年元旦，我军将其包围，围困一年，至1947年1月1日敌人弃城逃窜。当时为防止敌人重占聊城，将城墙拆除。

自公元992年，从巢陵迁至今城，至1983年为九百九十一年。

堂邑故城

《堂邑县志》记载：县境历史悠久，古为封侯之地。太古时，即谓“清”，因境西大河（古黄河）水浊，而境东漯水较之则清，故漯水又谓清河。《路史》云：远在四千五百年前，黄帝第五子封于清，是为清阳（氏），因封地位于清河之阳而名，今堂邑城西南有古清阳集，是为清阳（氏）之墟也。

春秋时为齐清邑，齐之西偏也。苏秦曰：齐，东有琅琊（诸城），西有清河，齐、赵分疆实凭此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设郡县，于县境置清县、发干二县（属东郡濮阳）。东汉章帝时，改清县为乐平县。曹魏时，又把二县划属阳平郡（治所，在元城—今大名东）。

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又合乐平、发干两县地为堂邑县，俗名千户侯，其址在今堂邑西北十里千户营，相传是隋朝弑君的权臣宇文护的营垒，其南有化及点将台，遗址尚存。县名是取县西北“汉堂邑”故城为名。

今对乐平、发干、汉堂邑作分别叙述：

一、乐平县故城。《续山东考古录》：乐平故城本汉朝清县，在今堂邑东南二十里许。东汉章帝时改为乐平县。隋开皇六年，改乐平

故城为阳平县，八年又改为清县。十六年分清县东置武水县，西为莘亭县。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莘亭并入莘县。

《水经注》：漯水经乐平故城东，县故清也。汉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封室中同于清，宣帝封许广汉少帝翁孙于乐平并为侯国。东汉章帝，汉霍去病之孙霍山，被封为乐平侯。

二、发干故城。《水经注》：河水（黄河）故渎东北经发干县故城西，又屈经其城北。汉武帝以大将卫青破右贤王功，封其子登为侯国。高齐时发干并入清渊（今冠县地）。发干故城位于莘县东北四十里（今马桥村），为汉代马明府所管辖的发干故城。

马桥村东十五里，聊城县王庄西有一碑文曰：“马明府东关”。

三、汉堂邑故城。《考古录》曰：汉堂邑

故城，在隋堂邑西北二十七里。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陈婴为堂邑侯，婴孙午，继封尚馆陶公主，通典以此为汉堂邑故城。按：此城当在今治西北三十余里。

白雀城

五代时，堂邑改为清河县，寻复旧。

宋，堂邑县属河北东路博州（聊城）。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河决堂邑城毁，东徙十里始迁今址，县令耿几父建土城。相传城工甫毕，白雀数万翔集上空，因呼为白雀城，即今堂邑城。

金，堂邑属山东西路博州（聊城）。

元，堂邑属山东宣慰司、东昌路总管府（聊城）。

明，堂邑县属山东布政司、东昌府。洪武年间知县陈孟隆加筑堂邑城。

清，堂邑县属山东东昌府（聊城）。

抗日战争时期，曾改名为武训县（为纪念办义学的武训为名）。1949年建国后，恢复堂邑县，1956年，堂邑县撤销，分别划归聊城和冠县。堂邑城为聊城县堂邑区，1958年改为堂邑公社，1985年又改为堂邑镇，今为堂邑镇政府所在地。

武水故城

《元和志》记载：武水县本汉阳平县地，属东郡。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改乐平故城为阳平县，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又改阳平县为清邑，十六年（公元596年）分清邑置武水县，在武水沟之南，因名之。

《寰宇记》：武水即今博州武水县是也。五代时期，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河决冲没，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割属聊城。

《九域志》：聊城有沙冢镇即故武水城。

《金史地理志》：聊城有武水镇。

《东昌府志》记载：武水故城，在聊城西南五十里。宋大观三年（公元1110年）置武水巡司于此。《寰宇记》：故城内有石柱，后魏孝文帝所立，为业东之表。武水从石柱北是也。见《一统志》。

武水县故城，即武水镇（今沙镇）。从公元596年置武水县至公元955年，割属聊城止，共计三百五十九年。

王官镇

《九域志》与《金史地理志》均载：聊城有王官镇。

《山东通志》：聊城王官镇，在东南四十里，宋朝置镇，设巡检于此，今为王官庙。

《山东考古录·杂考》载：宋王官镇在东

南四十里，今作王官庙。

王官镇又叫王官寺，位于聊城东南四十里，在聊、阿之间，东汉古黄河西岸，即今王官庙。世代相传叫梁王城。一九三七年前原有七十二金神古寺院一片，系大型古建筑群，自东而西有五处大庙院相联，最东一处是“玉皇阁”俗名“玉皇皋”，为重檐高翘，斗拱承托的二层楼阁，东西北三面有走廊，南面有石柱古棚相连结，建筑宏伟，十分壮观。“玉皇阁”下层正中是玉皇大帝，两旁为天兵天将，楼上塑有“三清”神像，皋前有两道山门，塑有“四大天王”、“哼哈二将”。院西是罗汉庙，内有十八罗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又西是天齐庙，两廊房为“阎王殿”。再西是孔庙，塑有孔子、颜、曾、思、孟像。最西是佛爷殿。此外还有“土地庙”、“娃娃殿”、“姑娘庙”等四处小庙院，另外还有三处和尚

住宅，其中一处为楼房。

寺院前面自西而东，有二人合抱的古槐六株。寺院内外碑碣林立，又因墙壁或角落甚至屋墙内镶有很多小石碑，因之传称王官庙碑碣无数。古寺南建有砖石砌成的戏楼一座，在万人坑涯建有“魁星楼”，楼上塑有“魁星”立像，右手执笔高举，左手提一方形墨斗，作欲点状元之势。此即战前该镇古寺院之概况。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政府，拆除了佛爷殿，在原址建立王官镇乡农学校。一九四一年春，日本汉奸又在此安设据点，刨掉古槐，拆除了大部庙宇。一九五一年又拆掉玉皇阁，用其砖石在于集修建区公所、供销社。一九五六年，重挖四新河后，拆掉戏楼又用王官庙碑石在牛王庄西南四新河建一座水闸。至此仅存孔庙一座，碑石一无所存，王官寺何时所建，无可考证。

后 记

“聊城故城考”这个资料，是查阅了《齐乘》、《魏书》、《寰宇记》、《读史方輿纪要》、《水经注》、民国四年编著《山东通志》、《续山东考古录》、《东昌府志》、《聊城县乡土志》、康熙二年和宣统二年的《聊城县志》、《堂邑县志》、五八年的《县志草稿》、《文史资料》第一辑、《聊城地名考略》……等书及资料之后，经考证、分析、反复印证，一九八三年冬写成初稿。一九八五年五月又经增补核对整理而成。讹错之处，请读者予以更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

聊 城 古 迹

高萍踪 沈宝章

聊城西关吕祖堂

西关路北，旧有“吕祖堂”一座，是游人荟萃的地方。山门内东西两廊，可环行全院。院内三间正殿，中有佛龕，供泥塑金像一尊，这是吕祖神象。西间陈列几架签语，东间有几把桌椅，全殿整洁庄严，游人有肃穆之感。

出殿后门，庭院宽广。有一株老槐，树干苍劲，枝叶茂密，亭亭如盖，满院阴凉，下设石凳，备游人坐息。北房是座两层阁楼，上有一文士塑像，纶巾道袍，与舞台上的诸葛武侯相似。右手下按着一套书籍，神情逼真，栩栩如生。在阁楼檐下，向南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吕祖庙的戏楼，再往前是一湖碧水，芦苇片

片，直到南堤。湖中渔船往来不绝，渔歌阵阵，水鸟翔鸣，大有江南风味。往东望去，古老的城墙，屹立水边。城上有一片红墙碧瓦的建筑群，在夕阳下，雄伟瑰丽，如蓬莱仙阁，那便是有名的西城关帝庙。

阁东一跨院，三间北房，是主持道人的住室。庭院幽静，花卉多种，金鱼数缸，青草丛生。门联是：“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屋内陈设，古朴雅净，前后玻璃大窗，阳光充足。隔窗北眺，堤上垂柳，疏密相间，郁郁葱葱，行人时隐时现。窗下湖水涟涟，东边荷花，西边芦苇，直至北堤，与堤柳相映成趣。

出屋南行，是一座过厅，中悬一匾曰：“三契堂”。屋内有几椅，供人休息，墙壁上镶嵌着几十块二尺见方的石刻草书，显得满屋龙蛇飞舞，气象万千。石刻中有怀素的“自

叙”，岳飞的“满江红”等草书名帖，实为珍品，但不知出自谁人之手。有的说是纯阳仙迹，那真无处可考了。

三契堂檐下往西，可通西院正殿。往南有一便门，可通大街。路南正对西院大殿，有一戏楼，场地空旷，解放前，每年旧历四月十三吕祖庙会，这里演戏。戏楼抱柱上，有一副木刻对联是：“歌管楼台仙阙下，夕阳城郭画图”中”。（此对联是聊城状元邓岳钟所写，其联为木板制，白底黑字）。很能表达当时的情景。

玉 皇 皋

俗话说：“东昌府有三宝，铁塔古楼玉皇皋，”铁塔古楼还巍然长存，玉皇皋为解放聊城时拆去，现为利民大队铁工厂。

从闸口桥往东，经越河圈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原来路口西边有一座桥，叫迎春桥，

现在这里已建成民房及个体商号了。由十字路口往北走，是一条较狭窄的小街，旧称昭穆关，也叫北越河，往东不远，就是俗谓“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的小东关街了，再往东里许，有一座石桥，平整坚固，现仍保持原样。

过石桥，就是玉皇皋的三间正门，两边有两座边门，都是砖瓦结构，雄峻古朴。正门南侧，有一座石头小庙，飞檐翘角，玲珑剔透，连庙台约一人多高，里面供着手执铜鞭的王灵官。

走进正门，左右有两尊神：左青龙，右白虎，雄威武猛守护着庙门，使人见而生畏，青龙神旁有一尊小神，曰值时。

走进庙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坐东向西，有三间大殿。檐下一匾大书“三元宫”三字，书法苍劲道逸。两边各有配殿，南三间，

北五间，都是红砖绿瓦，砖木结构，也是飞檐翘角，雄伟肃穆，里面都供奉着泥塑神像。

三元宫正殿供奉的神像，正中为天官，两边是地官、水官，都是金身。再两边是十个彩塑的大元帅，左边是雷震子、马喜、王灵官、温良，还有一个已忘记姓氏；右边是高亭、赵公明、亲环、刘元帅，还有一位已忘记姓名。

两边配殿：南配殿三间，里面正中供奉的是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美髯飘逸的关圣帝君。左边是虎目圆，面紫黑，须如戟，手执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右边是眉目清秀，手捧黄绸包裹大印的关平。北殿东三间，正中供奉的是贵神，左边是财神，福神；右边是喜神，禄神，纱帽蟒袍，清眉秀目，很有一派文官气象。西两间供奉的是蟠首银须，慈祥和蔼的土地，及青面红发，狰狞可畏的鬼王。西边配殿

东山头下各有南北侧门一座，经常不大开放，可谓“门虽设而常关”了。南配殿西边，有石质钟楼一座，内悬大钟，古驳班烂，击之振聋发聩。

由三元宫往后去，又是一座宽敞的院落。院落尽头，是一座巍峨壮丽的崇楼高阁。檐下匾额赫然书有三个大字：“无二尊”，书法遒丽，行而带草，不知何人所书。翘角飞檐，四角悬以铜铃，微风吹来，叮当有声，如昊天之乐，飘逸人间。台基砖质，分二层，约一丈多高，下层高四尺，上层约一丈，正中石质台阶数十层。拾级而上，是三间大殿，四周围以半人多高的木质栏杆。大殿正中，供奉的还是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金身神像。左右两边是八个生肖神像，三官神像前是四个生肖神像，共十二尊，都是彩塑的。前面两根柱子上有张牙舞爪的二龙盘踞，活泼生动，栩栩如

生，神后上部，又是三尊金身神像，正中是斗母娘娘，法相庄严，左为王母，慈祥婉顺，右是银眉白髯，笑容可掬的南极老寿星。三尊神像后，靠墙及楼板为彩色山塑，有骑龙、骑凤、骑狮子、骑孔雀、骑麒麟的各种神仙，或飞翔于空中，或行走于山石树林之间，山洞中并有仙童探望，称为“万仙阵”，也称山塑，为鲁西北一带绝无仅有的名塑。再两边南北相对，列着八仙过海的八尊神仙，韩湘子、曹国舅、吕洞宾、何仙姑、李铁拐、蓝采和、张果老、及汉钟离。

八仙后面，靠南边有扶梯西向，靠北边也有一扶梯东向，大概是准备香客参拜毕下楼的扶梯。到了玉皇阁最上层（一共两层），两边柱子上有一付楹联，书法苍老遒劲，词句是：

尊号仰玄穹九天闾阖开宫殿
宸居腾紫气万象包罗拱极枢

上面有一块蓝底金字的大匾是：“昊天金阙”四字。

正中供奉着金身的玉皇大帝，冕旒抱笏，清眉秀目。左边配享的是真武大帝殷交，右边配享的是玄武大帝殷洪。传说殷交、殷洪都是殷王的儿子。再左边是长生大帝，右边是微生大帝，左右又各五个站班的神像，对面立着，纱帽蟒袍，抱笏恭立。不知是什么“神”了。

凭栏西眺，房屋鳞次栉比，树木蓊郁，光岳楼巍然立于古城中央，景色颇为壮美。阁后东南角院中有一口井，颇为紧邃，据说井中有一条龙，能腾空驾云而致雨。

一九四一年秋，作者曾游览过一次玉皇阁，并作诗一首，以记其建造壮丽，诗曰：

杖藜过石桥 攀登玉皇阁
入门神仙新 拾级秋风肃

阁高漫凌云 凭栏瞻四瞩
一声清磬里 经音随起落

可见景象之一班。

玉皇阁建筑于何时，已无据可考。据附近的一位七十七岁李英溜老人说：他年轻时不断在玉皇阁画庙及塑神（现在有些耳聋及说话不清楚），有明朝万历、正统年间的碑石。又据石碑考证，明嘉靖八年玉皇阁曾遭受一场火灾，后又重建。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以前，由道士张兰福看庙及主持香火，他不幸于民国十九年八月初六日逝世，以后又由道士张东云看庙及主持，直至解放围城时拆除。

傅 家 坟

傅家坟，在聊城城南偏西二三里，是清朝第一名状元、兵部尚书傅以渐的祖莹。建于明

代成化年间，自始祖至傅以渐为七世。莹地全部面积，大约有一顷多，里面柏树森森，入夏树荫密布，凉爽宜人。

傅家坟的大门北向，砖木结构。约一丈四五尺高，灰瓦起脊，灰色砖墙，两扇木质大门颇厚重，全部大门古朴坚固，大门上一石额，刻“傅氏先莹”四字，颜体。在二十年代，四周还有半人多高的花墙，以后渐圯而消失。

走进大门，是一甬道，不远处有一牌坊巍然耸立，石刻剔透玲珑，两旁石楹联，记得是：

赫赫阴功泽庇百年状元后

煌煌诰命同称三代宰相家

牌坊上的横额，是“皇恩宠锡”四个大字，笔力端正雄健，寓颜于柳。过去牌坊，甬道不远处两旁，有华表、石猴、石羊、石马、

翁仲等相对罗列，尽头石碑高耸如林，有御赐、钦赐的几块丰碑，高一丈多，字体恭正遒秀，造诣颇深，是傅氏祖先的莹墓。

傅氏先莹大门东边不远的地方，有一门并列，较矮小，门上石额曰：“傅状元莹”，进去门也是一甬道，不远处路两旁，有石柱二，上有望天猴各一，相向而立。再不远处，路两旁有石碑各一，上面是“文行忠信”、“清正廉明”八个大字，书法端健有力。过去不远，有一比地较高之屋基，大概是享堂倾圮以后留下的遗迹。不远就是傅状元莹，碑石林立，与祖莹参差。后面多较小无碑石之坟，大概是后代宗族的坟墓，最后有一小石碑，高二三尺，上有“皇天后土”四字，就靠近后墙了。

厚 遗 堂

人们都知道杨氏“海源阁”，但对“厚遗

堂”，大概有不知道的。解放前，我曾到过聊城至沙镇公路上的田庄，田庄西边是杨林（杨氏莹地），莹地门口有两棵合抱的参天大杨树，里面柏树森森，华表、石羊、石马、翁仲等对列，柏树下有浅薄的一层苍苔，比傅家坟较整洁、雅静。

田庄庄内路南有一座小院落，系砖瓦建筑，小巧雅致，院中地面青砖铺地，非常整洁。居室精致，宛如置身都市之中，大概是杨氏的别墅吧？南屋内靠西墙悬挂一块匾，棕黄底绿字，上书“厚遗堂”三个真书大字，不知何人手笔。

相传这块匾上的“厚遗堂”的堂号，是皇帝赐给的，那时，杨以增的先祖，曾任东昌参将衙门管理公文的小官，一天夜间，他接到一封公文，不知何故，要屠杀堂邑全县生灵，务使鸡犬不留。杨氏观后，一片恻隐之心，油然而

生，不知不觉竟在昏黄的豆油灯上一火焚之，焚烧以后，心里惴惴不安，后来上司追问原因，他说：“接到这件公文时，睡眼朦胧，不知不觉地在灯上焚烧了，罪该万死。”他这一举动，堂邑全邑竟免杀身之祸，以后皇帝知道了，非但没给他任何惩治，而且念其存心惻隐，反而赐给他“厚遗堂”三个字，作为堂号，以嘉其德。按封建迷信说，因为积下了这一赫赫阴功，以后杨以增位至显宦，子孙昌盛。

府 门

东昌府府门，在城内西口北，大门对古棚街，里面有大堂五间，（有现在七间这么大）。左一间多贮兵器盔甲，右一间贮人命案杀人之凶器，门常常锁着。共有四进院，有二堂、三堂（即花厅），最后为知府夫人所居之

院（官宅），并有花园，现在的城西北角西花园，即其故址。院内昔有绿云楼，是聊城八景“绿云春晓”的名胜古迹之一。

碑楼子

聊城闸口南太平街西头，井西边，以前有一座碑楼子，红墙灰瓦，飞檐翘角，古朴庄重，门北向，正对运河。里面有一统石碑，上首额是“圣旨”二字，两边是二龙戏珠石雕，碑有“聊城临清等五处永禁添设关卡”等碑文。据传是乾隆年间立的。那时东昌府为鲁西北政治、文化、商业中心，自立此碑后，因为关卡少、税轻，南来北往之商船，多在聊城装卸货物，商业倍加繁荣。

光岳楼杨氏匾

光岳楼二楼文昌阁上方，昔时有一匾，蓝

底黑字，为“光射十城”四字，为杨以增手书。盖昔日之东昌府，所辖为十县，即：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冠县、馆陶、高唐、恩县。

堠堠冢的传说

“堠堠冢”，在聊城市堠堠村西一里许。从前，它面积广阔，高如山丘，据说方圆占地十八亩，上面还有苍松巨槐，建有凉亭。如今，虽非原来风貌，但隆冢依然存在，且为不少考古学者所重视。

《堂邑县志》卷七，邱基童中记载：“堠堠冢在城北五十里，大邱崛起，土花斑斓，相传是古冢。通志以为毛州故城。又谓禹治水时，以青泥封筒，使系龟印其上，诸说皆妄也。按堠字从土，必是古堠无疑。”

“堠”字有两个解释，一说：“记里程

也，古者五里支堠，十里双堠。”《周书韦孝宽传》：“一里置一土堠。”另一说法是“堠程”，十里双堠，堠以记里，堠程犹言路程也。按《山东考古录》，曹县有冉堠，乃魏冉冢，则堠乃冢之别名也。又有的说法，这堠堠土阜，是古代战争时，用以传达警报的“烽火台”。也或者是古代佚名者的墓葬群。但至今缺乏可靠资料文字说明。

据堠堠近村的老年人说：这座堠堠冢，又名青龙山。堠堠镇残存的老圩子墙，传说是古时堠堠城遗址。当年这座城，规模很大，四门四关厢，居民稠密，商贾辐辏，并有很多大庙。这些庙宇，清末民初，还有部分未全毁坏，如东关有明朝万历年间重修过的天齐庙，西关有三皇庙，北关有周武庙，十字街有古棚，东南圩子内有文昌阁、奎星楼和白衣堂等。那时圩子内，有很多家豪绅巨富，高楼崇阁，

花园林沼，极一方之胜。现在，虽然已成历史传说，但保留下痕迹遗址，残砖缺础，时有发现。

堠堠冢，时被村人掘土挖洞，不断地掘出大方砖和石头来，证明了这个土堆，并不纯是泥土堆垒。一九六九年七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人进行调查时，发现由底层至顶部土堆上，中间夹杂着不少的汉代陶片、罐、瓮片、残板瓦、筒瓦、唐代莲花瓣、圆瓦当、东周的罐口、暗纹陶片、宋元磁片等。过去，冢的周围，树木荫翳，野狐出没，乱石丛莽中产生一种黑色蝎子，因而人迹罕至，甚至流传怪异故事，类似神话似的无稽之谈，成了神秘莫测的所在了。如今，堠堠冢依然存在，但这座巍然土阜之内，到底蕴藏有什么东西，仍然是无法解答的谜。

堠堠东圩子门外，有一座“崇兴寺”遗

址，寺早不存在。只从两块残碑上，看到：

“堠堠镇东有招提曰崇兴，古名刹也，不知创于何年……”等字句。碑是明代成化六年庚寅（一四七〇年）和弘治十年丁巳（一四九七年）重修寺院时立的。从这么多寺庙来看，五百年前，堠堠城经济繁荣，自有一番兴隆景象。而时移世转，沧海桑田，尽成陈迹了。

千户营与化及台

堂邑志“疆域”篇中，有木刻的堂邑县地图一幅。将县治城池及四围所属区域重要村镇、河流及有关古迹遗址，都一一勾勒出来，线条古朴生动，清晰可观。在旧城之西，有一处地方，北面是树木丛密，营寨簇立。稍南有危台高耸，羽纛飘空，好似在这一片幽静的山树中，蕴藏着千军万马，腾腾杀气。此处标明是“千户营”。志书“古迹”编是这样记载：

“千户营，在城西十里，相传是隋宇文文化及营垒，其南有‘化及台’遗址尚在。”

在这里一度屯扎练兵，筑台点将的宇文文化及，他当年曾引兵到过聊城，在聊属附近堂邑，驻扎军队并作战争布置。时间约在唐高祖武德一至二年（公元六一八—六一九年）。虽是时间不长，却为这地方添了一处古迹。如今这“千户营”和“化及台”依然存在，保留了一千三百年前的历史传说。

宇文文化及，是隋炀帝时代，安州总管宇文述的长子。由于他父亲官居显要，这化及也飞黄腾达，做到兵部要职。但这人性情凶险，放荡狂肆，不遵循朝廷法度。在长安时，因行为狡诈，不讲信誉，人们称之为轻薄公子。炀帝大业十二年，帝幸江都，化及随驾前往，在那一时期，因炀帝沉湎声色，近佞远贤，天下四分五裂，北方一带群雄割据，象梁武周起马

邑，林士弘起豫章，竇建德起河间，自号长乐王，李密起巩，自号魏公，肖铣起巴陵，自号梁王等等数十起。宇文化及这时官拜右屯卫将军。其弟智及，更是个凶狡之徒，官为将作少监，当炀帝权势存在时，他们作威作福，随波逐浪，还不敢狂谬妄为，如今眼看到形势危迫，他弟兄两人密议之后，便与郎将司马德戡，直阁裴虔通等，推化及为王，谋杀炀帝，乃乘夜纵火，引兵入玄武门，直至东阁，把炀帝牵出，历数过恶，将他缢死。所有炀帝弟蜀王秀，子齐王暕，赵王杲、及长孙燕王倓以下，宗室外戚，一并杀害。又将大臣虞世基、裴蘊、来护儿、肖钜、许善心等十余人，尽皆诛除。惟炀帝侄秦王浩，素与智及交好，化及乃立浩为帝，令居别宫，只许发诏画敕，不得与闻政事，以其权作傀儡，另谋篡位野心罢了。化及自立为大丞相，总百揆拥众十余万，据传有

六宫妃嫔，连炆帝后肖氏，也被他纳用占为己有。宇文文化及在江都搜刮财宝，恣意抢掠后，便率军离开江都，北取彭城（今江苏徐州境）水路西窜。经滑台（又名白马城，今河南浚县治），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攻仓城（浚县境），后来索性杀了秦王浩，自称起许帝。但是这种凶残不义之人，为众唾弃，当时河北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亲自督兵向化及进攻。唐淮南王李神通，也奉高祖诏命，亲率精锐部队，声罪致讨。宇文文化及这时因攻仓城不下，退据魏县（今大名府境），正在徬徨难定去向，忽闻有两三路大兵来攻，锋锐势猛，难以抵御，便连夜弃退魏县，东走聊城。当时城址在王城（今城东小店子村西，许田庄南）。旋即城破，被窦建德擒获，囚解乐寿（今河北省献县）磔死。

宇文文化及的简略历史，大致如此。他从魏

县溃退，东走聊城，也正是军马倥偬，抵死应战，负隅顽抗之际，中间似乎为时不长。聊城和堂邑，距离非遥，化及把堂邑西作为防线，在那里屯兵操练，还筑有点将之台，加以整顿，似有可能。不过考诸有关史料，缺乏详细记载，而千户营，化及台至今仍有其地。

忆国、共、美三方代表在山东省 筑先县（聊城）和谈片断

张 侠

一、谈判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了。它是被中、苏、美联合力量打败的。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日寇铁蹄所至，狼烟四起，庐舍为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奸淫。国民党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并采取积极反共政策，指示其一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等人员投降日寇，搞所谓“曲线救国论”，利用或配合日寇直接残杀我敌后抗日党、政、军、民，其残忍程度在某些方面不逊于日寇，而山东省筑先县（聊城）的国民党投降人员在这方面更甚。

聊城在鲁西北，是辖附近十几个县的重镇，是历代统治者的必争之地，该古城经过历代统治者修葺加固，城河之宽，城墙、城门之固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城池能够与之相比，城内还矗立一座全国少有的钟鼓楼。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该城被日寇攻陷后，范筑先将军英勇殉国、以王金祥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由在范筑先时代的“明抗战暗反共”，变为直接勾结投降日寇，联合日寇，共同反共、反人民。聊城失守后，国民党委任王金祥为聊城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又呈报委任齐自修为保安副司令。齐对外号称九个旅三万余人（实际只有万余人）。一九四一年王、齐命九旅副参谋长王克庄和该旅营长赵振华、付崇鲁等率部公开投敌参加伪军。

齐部三次公开投敌约一千余人，其余部队也和日寇、伪军一样，在我抗日根据地周围和内

地大肆修筑围寨。他们与日寇、伪军的驻地仅相距十几华里或三、五华里，彼此互不相扰，眉来眼去，并配合日寇或亲自率部攻打我抗日军民。这些民族败类所实行的政策和日寇一模一样（三光政策），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曲线救国论”作为遮羞布，不但不以投日寇当汉奸为耻，反认为这是在敌后保存扩大势力，反共反人民的良策妙计。所以，日寇宣布投降后，这部分在八年抗战中为虎作伥，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无耻之徒，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他们龟缩在城里，接替了日寇的防地，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伪政权、伪秩序、伪人员，对我抗日军民负隅顽抗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我筑先县（聊城）党、政、军、民根据毛主席发表的《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的精神，团结一致，配合我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拔掉

城外所有敌伪据点，平掉所有敌伪壕沟，解放了广大农村老百姓。将这一股伪顽党、政、军团团围在弹丸之地古城里，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城外周围挖了封锁沟，敌人不投降就困死其城里。我抗日军、政机关随即迁移到县城东关，抗日民主县政府、县大队均住小东关，博里馆小学，八路军主力三纵十团住大东关。

二、谈判经过

饱经战争磨难的筑先县（聊城）人民，听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地投降，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抗日军、民多么渴望有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民阖家又多么渴望能够团聚，在一块好好的过上几天好日子。但人们的美好愿望却变成泡影。靠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军火横财参战又晚的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侵略者，在八年抗战中保存实

力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代替了汪精卫，中国广大抗日人民前门赶走了两只狼，却从后门又窜进了两只虎。这些屠杀中国人民不眨眼的刽子手们，时刻都没停止向人民进攻。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美帝国主义随即动用他的大批军舰、飞机不分昼夜地把蒋介石的正规军以及作战物资运到被我党、政、军、民正要解放的大、中城市，以及其他战略要点和解放区前沿。我筑先县天空刚显露出一线曙光顿时就被美帝国主义运送蒋军的飞机和内战乌云遮盖住了。黑暗的气氛笼罩大地，沉闷的空气使人们喘不过气来。人们欢庆胜利的笑声顿时被飞机嗡嗡怪叫的嘈杂声以及城里伪军趾高气扬的漫骂声所吞噬了，人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因这时全国性的内战未准备就绪，就一面加紧内战准备，一面玩弄

假和平的阴谋，如美、蒋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以及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搞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进行所谓“调处”。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成立了山东省济南执行小组，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二月初，济南“三人小组”来到我筑先县（聊城）进行所谓调处，我方代表是宋任穷同志和邝任农同志，国民党代表是张叔衡（少将）。美国代表是戴满斯（少将）。国民党代表还隐瞒了身份，自称是校级官衔。筑先县（聊城）地方代表由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陶东岱同志和我作为该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也参加了这次和谈。

我筑先县（聊城）党、政、军民在当时物资极端缺乏，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奉

上级命令怀着亲切盼望和平的心情，积极做好筹备工作，为即将到来的“三人小组”提供良好的食宿条件。住宿所用被褥、床单、枕头统统是新棉布做的，酒会宴席所用的山珍海味、高级名酒不惜用高价到外地采购，并动员了全县所有名厨师前来掌勺。所有上下服务人员不分昼夜的为其提供殷勤的服务，上上下下和全县人民都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一天的下午四点多钟，三方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共约五、六十人分别乘大、小汽车二十多辆直奔我抗日民主县政府以及我八路军二纵十团防地——筑先县（聊城）而来，美国代表乘的是大型吉普车，自带行军睡具。代表们除在县政府安排一部份外，其余的被安排在附近学校、教堂等处。

代表们住下吃过了晚饭，十九点左右代表们来到东关天主教堂（美国代表住址），进北

门往东拐一排平房北屋通间里。它象个大会议室，在灯烛辉映下，桌子接桌子用白布罩起来的长方形会议桌，显得格外素雅。代表们按名字依次就座开始了谈判。美国代表这晚托病说身体不舒服没出席会议。当晚据伺候美方代表的我方小服务员张杰同志报告：实际上美代表一点病也没有，还暗地给他些美金钞票，说是给他的小费，叫他有些事要保密等。张杰同志将所谓小费如数交给了领导上。国民党代表全体出席，我方首席代表宋任穷同志出席了会议。

双方见面寒暄了几句后，国民党首席代表张叔衡一开始就以骄横的态度宣称他们这次来聊的任务，就是执行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强调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以及执行经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先生签署的文件（实际是讹诈）来此改编城里

的这部分驻军为正式国军的。其他所有行政文职人员继续供职等候调迁。另外他还要求我方迅速修复所占区交通公路、桥梁等。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文件包里拿出所谓北平“三人小组”签署的几份文件，在手里不停地摇晃着，以此来施加压力妄图压我们接受由他们改编城里所谓驻军的方案。

国民党代表发言后，以宋任穷同志为首的我方代表发言。我方在发言中根本没有理睬他们的所谓什么文件和“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而理直气壮地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城里伪军在八年抗战中对聊城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指出这部分伪军根本不是什么“国军”，也不可能编成什么“国军”，而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如果国民党中央政府将这些民族败类改编为中央军，那么中央政府的立场就无疑和日本帝国主

义者站在一块去了。这是筑先县（聊城）全县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双方代表这样的激烈辩论持续到凌晨两点多钟，历时七个多小时，最后直到我们将国民党代表驳得理屈词穷目瞪口呆才散会。

会后我方人员又在宋任穷同志主持下继续开会，商量天亮后的对策。大家一致意见是：

（一）发动全县受害群众推选代表，用铁的事实来向美、蒋代表控诉城里这部分汉奸队伍以及其他伪职人员残害群众的种种罪行。（二）在会上继续揭露批驳美蒋的假和平真内战阴谋，以及所谓“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谬论。我们谈判的指导方针是对和谈不抱幻想，不相信美、蒋代表的“好话”，不害怕美、蒋代表的恐吓，站在自卫立场上，根据朱德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发布的关于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命令精神，即凡被我抗

日军民所包围的城里伪军和其他伪行政人员，只有我军有权收缴其武器，按其罪恶大小处理。至于公路和桥梁的修复问题，待被围困的城里和其他据点的残敌受降或被处理后，我们自然会进行这项工作。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

早饭后我们按照会议的决定分别行动。上午九点多钟，陶东岱同志和我准备继续参加三方会议，但因国民党首席代表借故说是由于昨晚参加会议疲劳过度病倒了，不能出席会议，致使会议未开成。当时我们分析，他是被我方驳得理屈词穷无地自容而不敢参加会了。虽然会议没有开成，但三方每时每刻都没停止自己私下里的活动。

这一天，美、蒋代表频频接触，并派人与城里伪军、政头目联系，让他们推选代表出城和我见面并出席三方的正式会议。我方只允许

他们和我们接触，不同意这些罪恶多端的伪军、政头目们和我们坐在一起出席三方的正式会议。三方就此达成了口头默许。

第三天的上午城里伪军头目×××和伪县长×××等十几人的所谓“代表”出城来了。仇人相遇分外眼红，我们一见这些汉奸卖国贼就怒从心头起，这些所谓的“代表”，身穿各种颜色的便衣，头戴大小不一的瓜皮杂色帽子，多是些大烟鬼白面客（海洛因毒品）脸色腊黄，个个瘦的皮包骨头，走起来摇摇晃晃像是风吹就倒，精神颓废不振，见我们后耷拉着脑袋，说话少气无力。有的还带着近视眼镜，镶着几颗金牙，说起话来满口是国民党和汉奸的腔调。如说“敝人在城里给日本方面供职，是奉上峰的指示和命令，是权宜之计，现在日本方面投降了，应遵照中央政府蒋委员长的训令办事”等。一派胡言乱语。我们当场质问这

些民族败类们说：“你们的上峰是否指示你们和日寇一道残杀中国人民，一道对中国人民施行“三光政策”，一道奸污千千万万的中国无辜妇女？”问得这些坏蛋们低头不敢正视我们，无言答对。只是虚声虚气结结巴巴地用“这都是过去的事啦，是误会”等言词来搪塞。

这时我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代表控诉团象潮水般地涌来。代表们住满了东关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庄，并带来了大批血泪斑斑的控诉材料和物证，很多受害致残的典型人物也亲自来了。这些汉奸卖国贼见势不妙，就想溜回城去。但是回城必须路过四、五华里的东关大街，大街两旁这时已站满了愤怒控诉的群众，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向他们讨还血债”的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锣鼓声、喇叭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事前

要不是规定了“只准动口，不准动手”的纪律，群众准会把这伙卖国贼撕成碎片。这些家伙们见了怒不可遏的群众，个个象惊弓之鸟，丧家之犬、灰溜溜地通过人群，争先恐后，抱头鼠窜，跑回了城里。

群众代表以后又分别聚集到美、蒋代表团的住地，要求美、蒋代表出来接受对城内汉奸卖国贼的控诉。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美、蒋代表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国民党代表借病龟缩在屋里宁死也不敢出来和群众见面，只有美国代表还貌似公正地，走出屋来，站在大汽车上、高台上，挥舞着两只大手，摇头晃脑装腔作势地向愤怒的群众演讲，他阴险狡猾地说：

“我们美国是公正的，是来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的。听了大家的控诉我深表同情，请大家先回去好好过日子，我一定公正地处理问题”等。想以花言巧语来搪塞迷惑群众。但群

众未听他的那一套，住下来未走。

第二次谈判是在第三天的晚上，国民党首席代表还是“托病”不出席，美国代表也均未出席。只是国民党其他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那副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的态度消失了，但一接触实质性的问题，如城里伪军应由谁来受降问题他们就玩弄推、拖、磨的手法，重谈原来的老调，如说：什么“这是上峰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啊’，他们的首席代表有病未能出席，有些事情他们不好说，不当家啊。”等等，就这样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磨蹭到凌晨一点多钟。结果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但美、蒋收编伪军的阴谋也未得逞。

三、结尾

美、蒋代表第四天见情况对他们不利，便单独离开我县溜回了济南。他们走后，宋任穷同志又召集我方全体与会同志开会，总结这次

谈判的经验。我记得大致有如下三条：一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对敌斗争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只要好好学习，认真贯彻执行，就能克服困难。二是我们共产党人时时刻刻不管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我们就能战无不胜。这次谈判，国民党代表刚刚来不是气势汹汹，拿着所谓“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文件来压我们吗？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但只要我们立场站得稳，有党中央，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精神，我们就能打败任何强大凶恶狡猾的敌人。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只要发动起来了，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次群众对城里伪军控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会后，我方所有代表全部离开本县，各地来的群众代表控诉团也陆续返回自己的家乡，

至此三方代表和谈暂告结束。城里伪军仍然继续被我军、民紧紧地围困起来。

1985年6月于郑州